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1942年刘少奇山东之行 张忠年 孙芹丽 04

【峥嵘岁月】

抗日保家国 一门四英烈
——抗日支前模范徐奎元家族 徐之表 10
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战 赵连福（口述） 14
铁军大帐追歌行（七）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7

【名人素描】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末代主席秦德纯 石绍庆 23
萧衍：爱做和尚的皇帝 我爱看历史 29

【文化掇英】

革命的熔炉 艺术的堡垒
——从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到“鲁艺宣大” 华 楠 35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七）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44

【史海撷萃】

陶墩阻击战 抗战军魂 46

【蒙山沂水】

兰陵县塔山遗迹探考 田乐峰 50
徽章中的历史
——谈民国时期的临沂省立中学校 雨 田 刘京君 54

【探索发现】

孤胆英雄李海启 高 雷 56

【诗画赏析】

沂蒙抗战版画群体（上） 大荒堂主 60

【史料辑存】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及后续发展（下）
泰宁军 63

【影像沂蒙】

山东省立第五中学 本 编 65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五） 赵丹峰 68

【文明之星】

临沂“谷子地”郑沂家 林伟伟 罗志强 72

【沂蒙名医】

“推”开阴霾是晴空
——记“推拿圣手”时晓光 惠东波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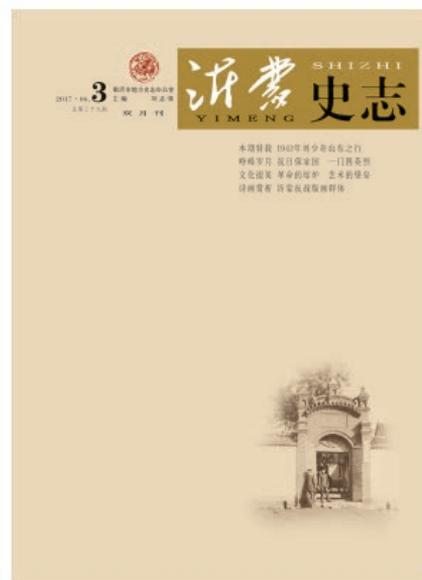
【史志动态】

80

封面：山东省立第五中学
（详见本期《山东省立第五中学》）

封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谋攻》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1942年刘少奇山东之行

张忠年 孙芹丽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此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两年多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可是，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人都不赞成刘少奇回延安去，认为“他不能暂离华中，否则会失掉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刘少奇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缓期起程。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化名胡服）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华中局负责干部一直送到黄河大堤，同刘少奇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遥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此行极为重视，直到3月21日还在为刘少奇途中

的安全担心，并致电叮嘱：“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但是，刘少奇已经出发3天了。

刘少奇急于启程的原因是：毛泽东委托他在回延安途中，帮助解决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早在2月初，毛泽东就把有关材料转给了刘少奇，并电告他：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3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山东问题再次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刘少奇是个心中只有工作的人。华中工作安排就绪，他已在考虑山东的工作。他曾向中共中央索取更多的有关山东的材料，毛泽东答复他：“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于是，他就提前踏上了去山东的行程。

二

山东地区西邻冀豫，北依平津，东濒大海，南连陇海铁路，境内山脉纵横，地势复杂，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地区的重要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直接威胁着敌人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津浦铁路，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梁上的一把利刃。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就特别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的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先后发出了《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等电报，进一步阐述了山东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并对山东根据地的任务和战略部署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阶段（即敌人的新进攻已经到来），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山东，正是意图考虑解决山东的“领导骨干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毛泽东的这种考虑更加成熟，意图也更加明显。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考虑到去延安路途无保障，山东又需统筹全局之人，曾电刘少奇，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7月9日，毛泽东再次专门致电刘少奇，提出了“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际局势后指出：“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个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

但是，山东近两年的工作却令人忧虑。1940年以来，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山东，仅1941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分歧。他们先后向中央申述各自的意见。中央一方面令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部队的八路军第一

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回延安汇报，一方面多次电示：“彼此间关系必须更密切，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但是，成效不太明显。山东党的集体领导没有形成，自然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工作。这同它将要担负的任务很不适应。

因此，毛泽东电令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来解决山东问题；并电告山东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三

1942年4月10日，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身材颀长、面庞清癯的刘少奇身穿灰色旧中山装，脚踏黑色粗布鞋，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所在地——朱樊村。至此，刘少奇一行经过22天的千里跋涉，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位于沂蒙山区南麓的朱樊村是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刘少奇等到来后，就住在这里一家破落地主大院的三间正房里。他住正厅靠右边的一间房子，用两块门板做床，用包袱里换洗的衣服当枕头。正厅做会客和饭厅用。左边的房子由警卫员居住。刘少奇对山东的工作并不陌生，山东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的工作，是在他指导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对这两年的工作情况不很清楚。

刘少奇一到山东根据地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先后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谈话三天，接着又同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谈了一天。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朴实话语，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感到无比亲切；他那一贯民主和谦逊的作风，令人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那深入细致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钦佩不已。他还听取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4月26日，他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同分局成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萧华、陈士榘等交换意见。在会议上，刘少奇以他那一贯民主和谦虚的作风，启发每个同志开诚布公地摆问题、谈看法。会上有不少正确的意见，如罗荣桓主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分局有些同志认为减租减息要提请参议会通过，然后实行。刘少奇认真倾听各方面意见，还不时插上几句话，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会议连续开了几天，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意见都摆了出来。经过思想交锋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少奇同志做了总结，大家思想逐步明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会后，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在会上，我对五年来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作了一个报告。参加者均有意见发表，他们都完全同意我对山东过去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为了推动山东工作的全面进步，刘少奇抓住了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刘少奇对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一进入山东境内，就千方百计地接近群众，一见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得怎样啦？……”而且他还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经过观察，刘少奇感到山东分局工作的弱点在于：“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针对山东分局负责人忽视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在这里列举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群众，就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对手勒死的后果。他十分尖锐地指出：

“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关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刘少奇指出：群众运动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

接着，刘少奇又连续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报告，对如何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的这些报告“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充满了信心。”萧华形象地称“实际上是办了一次很好的党校。”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他“白天参加会议，夜里忙于工作，在暗淡的油灯下，经常熬到二三更天”。据当时随身警卫员吴文桥回忆：“由于连续几天的报告，刘少奇嗓子都哑了，几乎讲一句话，就要咳嗽一声，脸色也不太好。我说找医生来看看吧，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说：‘不要紧，上了一点火，过两天就会好的。’”

刘少奇的心血没有白费，山东的工作很快出现了转机。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刘少奇身体力行。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及时为山东领导人提出明晰的指导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说：“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一起来抓这一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亲自下去走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萧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四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期间，刘少奇还帮助山东分局切实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当刘少奇来山东的途中，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党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浓厚存在，因之在锄奸工作上犯过严重错误，使党在苏鲁豫边区、泰山区、滨海区的党与群众工作遭受了严重悲惨的损失，许多党的干部无辜受戮，至今工作不能恢复。中央和北局虽自去年到现在几次严厉纠正，但仍未彻底转变。”“望你到山东时，对此问题彻底检查，以纠正山东党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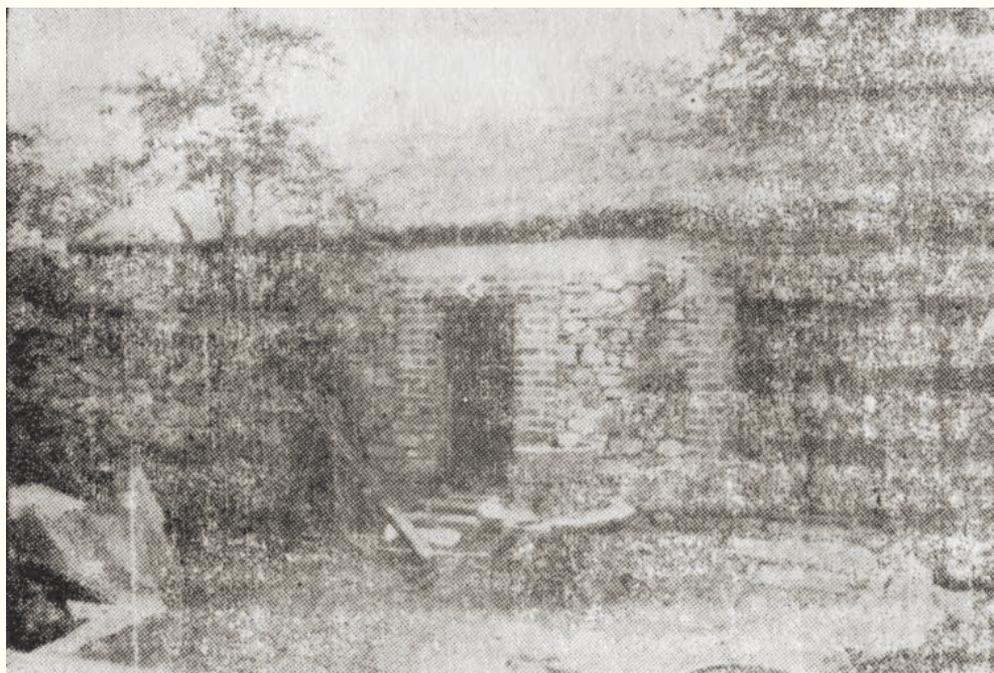
刘少奇遵照中央指示，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认为：这是被坏人钻了空子，这种自

我摧残革命力量的惨痛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切勿重蹈覆辙。他指示山东分局组织部：“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锄奸工作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于已经查明的错案、假案，应予彻底纠正。”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总结全山东锄奸工作的决定》，强调今后锄奸工作要有严格的制度，“任何地区或军队逮捕任何一共产党员，必须经过分局、师政、纵政批准后执行。否则一经查出，直接负责之党委及锄奸同志应受党纪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党籍。”罗荣桓并亲自主持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凡属搞错的马上平反，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从而稳定了山东局势。

刘少奇还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山东文化教育界一部分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来这里参加抗战，并组成“国民抗政协会”，愿意接受山东分局的领导。1940年9月，分局却帮助他们改组成半政党性质的组织，改名“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认为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共合作”，还建立起一套同中国共产党平行的组织和两个旅共4000人的军队，每年由当地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数十万元经费。然而，他们的某些基层组织却被坏人利用，经常同中国共产党闹独立，妨碍抗战工作的开展。有几个县乡干部直接来找刘少奇请求帮助。刘少奇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又派秘书深入了解情况，把问题基本弄清楚后，他征求了分局意见，约“抗协”负责人座谈。

夏夜，月白风清。“抗协”十几位负责人来到刘少奇住处院内。刘少奇向他们诚恳地阐明抗日政党、政团和群众组织的不同性质和任务，以及“抗协”同中共的关系，请他们仔细考虑。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

经过一天的考虑，“抗协”负责人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根据胡服先生恳切详尽的指示，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酝酿，深深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抗协”作为一个政党和政团不会对抗战工作起多大的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前途。希望共产党批准“抗协”成为山东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统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民族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不久，“抗协”的各级干部分别到有关部门工作，它的军队并入山东纵队，“抗协”活动逐渐结束。



刘少奇1942年五六月间在临沭县东盘村居住过的草屋

五

山东工作走上正轨后，刘少奇致电请示中央，准备启程继续前进。因不久前日军在华北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敌情依然严峻。毛泽东担心刘少奇路上的安全，电示他：“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似较适宜。”刘少奇便又住了下来，随着一一五师师部，在鲁南和江苏北部一带同日军“兜圈子”。

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4个月，7月下旬，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原山东领导人黎玉等回忆说：“当时从滨海去鲁西路程几百里，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特别是津浦铁路，大家都为少奇的安全担心。分局领导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小部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个方案，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却毅然同意铁道游击队送。于是他就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站在战士的行列里起程了。”

刘少奇一行渡过沐河、沂河，经临沂、费县和抱犊崮山区的滕县，到达枣庄西南。他们将在这里越过津浦铁路。护送刘少奇的是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和杜季伟等。当他们走到距津浦路三四百米处时，突然从北面闪来一道白光。伴随着突突的响声，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驶来。刘金山、杜季伟后来回忆说：“巡逻车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瞎打了一阵机枪，又突突地向沙沟方向开去了。铁路两边又恢复了平静。我们赶忙以战斗的姿态，掩护着刘少奇，沿着干沙河，一溜小跑，从涵洞穿过了铁路，接着离开干沙河，避开大道，插向小路，直向微山湖边挺进。”

由于日军正在对湖西地区进行“扫荡”，刘少奇等在微山湖中心一条小船上停留一个多星期。敌情稍有缓和，刘少奇等继续前进。他们在丰县同湖西军分区派出的骑兵连取得联系，由骑兵连穿过湖西区。

这里是鲁西区党委辖区，处在晋冀鲁豫四省的接合部，是一片沙土地带。地无三尺土，到处是沙窝。当地百姓主要靠种枣树、挖土盐维持生活。日军为了隔绝鲁西同冀南和晋东南的联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进行严密经济封锁，群众生活困苦极了。这里的负责人缺少办法，情绪低落，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密切。

刘少奇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把辖区几位负责人请到住处，听取他们汇报，给他们出主意。刘少奇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生活下去，动员老百姓种植瓜果蔬菜。他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给群众东西，而不是向群众要东西。”“我们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中生根，要使群众相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这里的。”他还帮助鲁西区党委解决了这里比较突出的大刀会和小刀会问题。鲁西区的干部深有感慨地说：“这回胡服从这里经过，真给我们解决了问题。”

8月下旬，刘少奇等离开山东，重新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从春暖花开，到秋实累累，刘少奇在山东近5个月的日日夜夜，始终和山东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共同探讨革命问题，栉风沐雨，劳顿奔波，废寝忘食地工作，充分展示了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

抗日保家国 一门四英烈

——抗日支前模范徐奎元家族

徐之表

在抗日战争年代，沂蒙老区460万人中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20多万人参加支前，有3.1万多名沂蒙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沂蒙红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等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在这些事迹中，徐奎元家族抗日、支前模范事迹一样名留青史。

家庭殷实 家风传承

“黄山有个徐老唐，地有千顷不纳粮，全靠延庭那杆枪。”至今，罗庄区黄山镇前黄山村上年纪的人还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徐氏家族的家势和家风。现在年逾八旬的徐景说，徐延庭是徐唐的侄子，练得一手好的红缨枪，“枪戳滚豆，撒沙不漏”。随便扔出一粒黄豆，红缨枪都能戳中滚落的黄豆。加之前黄山村紧靠兰陵县的青竹村，青竹长拳更是远近闻名，这也影响到前黄山村，人人习武。于是，即便在匪盗横行的年代，老徐家无人敢冒犯，家业得到了稳固发展。

徐奎元家族在一世祖徐唐时期，开办酿酒作坊。由于酿出来的酒口感润滑、醇香，很快，老徐家的高粱佳酿名号传遍鲁南苏北，客商争相采购。由此，前黄山村徐家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又相继开办了酒店、养殖场，购置了上百亩的田产。虽然



称不上豪门，但在临沂南乡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殷实的家财并没有使徐氏后人走向堕落和纨绔，这得益于徐氏家族祖辈所传承的“以德为先，与人为善，爱国爱家，诚实守信”的家风，徐氏家族也因此很受乡里人敬重，徐氏与临沂历任地方官员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其中，徐唐后人徐奎元（字梅亭）交友广泛、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与时任临沂县长的范筑先有这样一件事：一天，范筑先接受南乡群众伸冤，范筑先开口便问：“是否路过黄山乡？”群众表示路过，范筑先又问：“可将你的冤情告知徐奎元？”群众表示没有。处理过此事后，范筑先告知周边群众，以后南乡有冤可先行找徐奎元解决，让他明辨是非即可。可见徐奎元的威望。正因如此，国难之时徐奎元家族义无反顾，一呼百应，投身抗日。

捐资捐物 临沂抗战

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五师团主力坂本支队及伪军刘桂堂部约2万人，自胶济线南犯诸城、沂水、莒县，直扑临沂。驻守东海、连云港一带的庞炳勋部，火速赶到临沂坚守。3月26日，日军集结1000余人，在十几门大炮的掩护下，绕道转至临沂城西义堂一带，伺机环攻取城。这年的3月，时任黄山乡乡长、联庄会会长、特派员的爱国乡绅徐奎元，听闻战士们抗击日军保卫临沂城的事情以后，立即拿出家里的粮食医药送往前线，为临沂的抗日斗争贡献绵薄之力。

深交“货郎” 全家抗日

1938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中共地下党员丁梦孙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在临沂南乡三重村、丁庄一带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乡绅名流的支持，丁梦孙等人亲自前往徐奎元家中。当丁梦孙表明来意后，徐奎元看到了希望，当即欣然答应，尽全力帮助丁梦孙开展抗日斗争。丁梦孙被徐奎元的爱国之情所征服，同时为了掩饰身份，保护自身安全，便于开展工作，丁梦孙主动提出拜徐奎元为义父。

“香烟、洋火、桂花糖喽！”丁梦孙白天一面以货郎的身份挑着货担，带着徐奎元的粮食批条为前线筹措粮食；一面通过徐奎元的引荐在丁庄、三重、册山一带洞察各村情况，结识其他乡绅，发展地下党员，壮大鲁南苏北地区抗日组织。晚上便悄悄返回徐奎元家中吃住，长达一年之久。期间，徐奎元将丁梦孙引荐给自己的亲家庄坞镇杨锡九（抗日烈士，1940年任临沂县参议会副参议长）认识，并动员自己的女婿杨允熙（烈士，兖州战斗中牺牲）参加八路军抗日。徐奎元发动一切爱国抗日的壮举深深感动着丁梦孙，丁梦孙介绍徐奎元秘密加入党组织。同年5月上旬，徐奎元与丁梦孙、马培卿、李占五、郑竹云一起参加了在丁庄小学召开的“第五战区临邳青年救国团”成立大会，丁梦孙非常感谢徐奎元为抗日做出的突出贡献，希望他出任青救团内职务。忠厚朴实的徐奎元出于各方面原因给予婉拒，推荐自己的儿子徐洪恂、徐洪贵参加了丁梦孙的临邳青年救国团早期组织。两位青年血气方刚，爱国抗日热情高涨，徐洪恂自幼习武，练就一身硬功夫，枪法更是百步穿杨；徐洪贵略懂医术，文采出众，习读兵法，头脑灵活。丁梦孙也视二位如亲人，并介绍徐洪恂、徐洪贵二人在青救团参加党的组织。

后来随着丁梦孙的抗日队伍越来越壮大，丁梦孙在黄山一带的踪迹也被日伪军所关注。当时，承蒙祖上基业和乡亲拥护，徐奎元掌握李庄、黄山、册山等多地的“地亩册”（土地账簿册），拥有“地亩册”便知道老百姓手里到底有多少土地、该

交多少粮食。徐奎元手中的“地亩册”一时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和日寇眼中的香饽饽，各方势力都千方百计争取他。但朴实的徐奎元心里非常明晰，日寇在我中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做为联庄会会长的他在与各区村代表开会时明确提出“宁死不当汉奸”。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南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坚持抗战。日伪军早已垂涎徐奎元手中的“地亩册”，想借着搜查丁梦孙的机会要挟徐奎元。徐奎元作为联庄会会长，早已通过眼探得知消息，秘密让自己大儿子徐洪俊带上“地亩册”去通知丁梦孙，并协助他去其亲家杨锡九所在的庄坞一带暂避，徐奎元独自应对狡猾的日伪军。徐洪俊和丁梦孙二人沿着村东沂武河边小路与日伪军周旋许久才得以脱身，徐洪俊告诉丁梦孙说：“我出来的时候，父亲告诉我，现在国难当头，你在我家中开展抗日斗争，我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徐氏家族愿为抗日事业再次贡献绵薄之力，让我将‘地亩册’交给你，可以解决我们鲁南地区抗日队伍后勤保障问题。”丁梦孙再次被徐奎元大义凛然的爱国情怀所感动。经过徐奎元的周旋，日伪军扑了个空，悻悻而归。但因丁梦孙的行踪已经暴露，只能在庄坞徐奎元的亲家杨锡九家继续开展抗日武装工作。自此庄坞成了丁梦孙开辟的另一个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14日，临沂市各界人士在庄坞涌泉召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沂市参议会，杨舒臣任参议长，王兆芳（王彦初）、傅普仁、张准亭、杨锡九等为副参议长。同时，成立了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推选丁梦孙任县长。

“老屯惨案” 一门双烈

1938年10月，徐洪恂、徐洪贵二人因爱国抗日表现突出，经丁梦孙推荐，派他们到司贺峰、何建华、王尤轩和王伯英组建的“山东农民抗日自卫团”学习，以便回“青救团”更好的开展工作。

徐洪恂、徐洪贵两兄弟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带着丁梦孙的介绍信，前往农抗团驻地——老屯村。因农抗团第一期已经圆满结束，二人参加了10月20日开学的第二期。农抗团的成立给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临沂人民带来了希望，但也引起了日寇的恐惧和仇恨。敌人把农抗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38年11月6日，大雾弥漫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声音，日寇集中了9辆汽车，载兵200余人，黎明前由临沂城悄悄出动，从侧后向老屯村驶来。汽车停在村东门外土地庙前，兵力马上散开。这时坐在最北面位置上的一区队一班班长高秉田十分警惕，立即报告了何建华。何建华扭头向北仔细看去，果真是敌人的车队，当即命令队伍撤退。徐洪恂、徐洪贵二人借助房屋和树林的掩护，向西北方撤退，很快摆脱敌人重围。当看到其他学员遭到日寇围堵时，他们便带领其他配枪学员从侧面向敌人突然发起袭击，迫使敌人不得不抽掉一部分兵力扑向他们，吸引了敌人火力，为其他学员突围创造了机会。由于敌众我寡、武器悬殊，在协助其他学员突围时，徐洪恂、徐洪贵壮烈牺牲。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共牺牲了37名农抗团学员，其中有谢兴邦（今罗庄区褚墩镇人）、付连三（今兰陵县磨山镇华岩寺村人）等人，史称“老屯惨案”。出生于老屯村的王庆祥，当时在农抗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宣传工作，对农抗团的前后事情比较了解。“农抗团的创建，最早是林老（林伯渠）和吴芝圃等领导的指示，由司贺峰等人到山东找到当时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具体组织的，学员们每天都唱抗日救亡歌曲，第二期学员猛增到了500多人，其中就有为了掩护战友撤离，壮烈牺牲的徐洪恂、徐洪贵两位烈士。”王庆祥饱含泪水的回忆着当年的抗日经历。

“老屯惨案”发生后，家中得知二人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派人偷偷将两位英雄的尸体抬回。只见弹孔累累，全身是血，深深触痛了徐奎元的心。因怕引起鬼子

的注意，便直接抬到祖林，草草下葬。送尸体回来的还有一位骑着枣红大马、面色红润、身着八路军军服的人，人称“老司”，此人便是司贺峰。老司带来了丁梦孙的书信，信中表达了对二人牺牲的悲痛之情和自己的歉意。

血洒战场 精神长存

爱国热情与丧子之痛交织在一起，更激发了徐奎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痛恨，他倾尽家财支持八路军抗日保家，八路军山东纵队钱钧团长、汪洋政委率领沂蒙山区根据地四支队二团，于1938年11月15日来到黄山、蝎子山一带开展工作。当时钱钧团长带领八路军200多人就驻扎在徐奎元家中。徐奎元拿出家中钱粮和药品，安排八路军队伍吃住。因队伍庞大，引起了日寇的注意。

11月25日，日寇集中兵力“扫荡”，四支队二团和“农抗团”紧密配合，在黄山、蝎子山展开了一场反“扫荡”的战斗并取得胜利。吃了败仗的日本鬼子从临沂城内调集了大量步兵和炮兵再次进行大规模扫荡。丁梦孙在徐奎元家工作时发展的“内应”提前将消息告知钱钧团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决定分散转移。徐奎元也安排家人随军南撤。日寇在黄山村北架起大炮进行轰炸，但因部队南撤并未造成伤亡。穷凶极恶的日军沿着沂武河向南扫荡并在苍山庄坞一带和八路军开战，钱钧团长采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安排一小股部队在河东打枪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果然中计，大量步兵向河东扑去，仅剩少数步兵和炮兵。我军主力迂回包抄围剿鬼子炮兵，神兵天降，使鬼子的炮兵措手不及，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打死日本兵多人，缴获钢炮2门，机枪5挺，弹药物品一宗。此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并获得上级表彰。钱钧团长代表部队向徐奎元表示了感谢。

后来，徐奎元带领他的二子徐洪刚加入了鲁南抗日民族大队，并担任第六大队大队长，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1月12日，日寇调动大量兵力围攻抗日根据地苍山矿坑。徐奎元带领大家激战数夜，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英勇战死，享年52岁。后其二子徐洪刚也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但失去主心骨的徐家依然继续为抗日贡献力量。

自1938年至1942年的四年间，徐奎元家族捐出了几乎所有的田产，还发动身边亲朋投身抗日。徐奎元一家先后四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徐氏后人，本人经过多年的探寻，从最初村里及周边老人的日常言谈，到与地方政府党史学者的交流和党史资料记载，再到成功寻到徐洪恂、徐洪贵两位烈士的战友王庆祥，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于2015年12月31日收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追认徐洪贵、徐洪恂为烈士的批复》，2017年2月，罗庄区委党史研究室、区文广新局联合开展了抗日支前模范徐奎元故居等抗日战争遗址普查工作。

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战

赵连福（口述）

“在我们村西面山岭间，1939年曾发生过一场战斗，是张学良的旧部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六六六团在此与日本鬼子打的一场阻击战，那年我11岁，已经记事了。我参加工作后，注意收集了这场战斗的有关信息，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基本理清整个战斗的过程和来龙去脉。这场战斗，日本鬼子遭到重创，500余人的部队伤亡了230多人，可以说是个成功的大胜仗。但我查阅了许多有关沂蒙抗战的历史资料，至今也没有发现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我觉得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事实，不能就这样被淹没了，应该让人们知道并记住。”

击毙了6个日本侦察兵

1939年初夏，日本鬼子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向鲁南地区进行麦季大扫荡，6月6日（我记得那天是芒种），一股约500余人的日本鬼子，从莒南县西部



第五十一军士兵

的烟台岭方向进侵，可能是想通过烟台岭这条路线向北扫荡。当时驻防在大店镇以北丘陵地带的中国军队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六六六团得到了这一情报，根据师长常恩多的命令，六六六团团团长关靖宇率部过来阻击。一一一师原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旧部，是一支战斗力很强并积极抗日的军队，师长常恩多是一名爱国将领，这次是从苏北开赴山东前线打日本鬼子的。

6月6日早晨，日本鬼子派出的7个侦察兵来到了石杭村的西南角，向麦场里打麦子的人询问中国军队活动情况。鬼子很狡猾，讨水喝时，先让老百姓喝一口他们才喝。此时六六六团派出的侦察兵已渡过沐河到达了村子东南角的一片杨树林里（树林里有一大片坟地），他们发现了日本侦察兵后便隐蔽了起来。当几个鬼子兵刚走出麦场，那边的枪就开火了，“嘎、嘎、嘎……”，一阵清脆的枪响后，7个鬼子兵倒下6个，只有一个骑自行车跑掉了。

听到枪响，刚走到村西大岭附近的日本鬼子大部队，立刻抢占了西大岭顶上的张家墩一片杨树林地，就地挖工事准备战斗，这时六六六团的大部队正从西北庄山岭和土巴岭向这些山岭上打炮。枪一响，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就像炸了锅一样向附近山岭上跑，找地方躲了起来。我随着大人们跑出西村头后，看见六六六团的士兵们一身灰色衣服，弯着腰端着枪沿着交通沟正急速向前运动，准备抢占我们村南面和北面地势较高的一片地堰。由于山岭上事先挖好了很深的交通沟，所以打不着六六六团的官兵。

日军指挥所被炸平

日军占领的张家墩上只有几棵杨树和零星的坟墓，并无其他遮挡物，地势虽比中国守军抢占的地堰高些，却完全暴露在六六六团的射程之内。

大约中午10点，六六六团完成了战斗部署，全部进入阵地。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全团利用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向日军发起猛烈射击。大量的枪弹、炮弹和手榴弹疾风暴雨似的射向日军前沿阵地，顿时狭窄的张家墩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被炸起的石土在半空中飞扬，到处喊杀声震耳欲聋，打得敌寇抬不起头来。

在强大火力压迫下，日本鬼子垂死挣扎，组织兵力开始反扑。先是两辆装甲车开道，机关枪压阵，步兵跟着向前冲锋。日军与六六六团的阵地之间是一“U”型地势，中间一马平川，没有障碍物可利用，且又是由低洼处向高地冲锋，所以日本鬼子很容易被射中。等敌人临近，关团长一声令下，隐蔽在战壕里的中国守军立刻射击，重枪重炮组成一张密密的火力网，打得日本鬼子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日军在指挥官的督促下先后组织了3次大反扑，均被打退，装甲车慌慌张张地躲避，仍差点报了销。

战斗进行到决战时刻，关靖宇团长决定重点使用炮击。六六六团武器装备好，不仅士兵使用的是威力和准头都很好的捷克枪，还有好几门重炮分设在了不同地方。

经过仔细观察，富有作战经验的关团长，发现鬼子的指挥部不在张家墩，而在后面的西洼子，便决定炮击西洼子炸掉日军的指挥所。村里老百姓看见他亲临炮兵阵地，一手握着左轮枪，一手挥着手臂，对炮手下达命令：“向西洼子小沟开炮！要把小沟给我炸平，要是打不准，以军法论处。”当时他声音特别大，情绪也很激昂，立刻几门重炮同时向西洼子射击，炮弹准确地落到了指定地点，这条小沟几乎被炸平了。躲在比张家墩还要高的赵家墩子上的老百姓们亲眼目睹了西小洼子鬼子被炸惨的景象：他们就像屎克郎一样乱蹦乱跳，鬼哭狼嚎的，死的死，伤的伤，指挥官当场丧命。

经过半天激战，小鬼子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畏缩在工事内苟延残喘，再没有

出击之力，六六六团士气高昂准备寻找战机一举将敌歼灭。

就在这时（大约下午4点），从西面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关团长得到情报：日本鬼子大批援敌已渡过汀水河，向张家墩进发。情况有变，六六六团立即撤出了阵地。据说，原来关团长命令骑兵连在汀水以西阻击敌军援军，可骑兵连没能及时赶到，至使敌援军顺利过来。

惨无人道鬼子兵

当天晚上（也有人说是次日凌晨），守在张家墩的日本鬼子进了村，焚烧房屋数百间，麦场上1000多亩没有脱粒的小麦也遭烧毁，被日本鬼子掠夺去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村里还没逃跑的老百姓，被他们枪杀了十多个，有几个上年纪的老人还被活活烧死在屋里，村里私塾学校也被烧成了一堆废墟，村里被糟蹋得一片狼籍，惨不忍睹。

小鬼子进了村就到处抢东西、抓小鸡吃。有人还亲眼看见，几个日本鬼子抓了一头耕牛，从牛大腿上活生生地割下一大块肉后，再把牛放走，牛痛得嗷嗷乱叫，满街跑，最后也就痛死了，真是惨无人道。

一位私塾老师在村里被抓住后，鬼子强迫着他抬死尸。鬼子的尸体码成一垛一垛的（有230多具尸体），他们就用汽车拉到村东边一块种麻的地里，挖了13个深坑，把尸体扔进去，泼上汽油烧掉了。一些还没有死的日本伤兵也被扔了进去，焚烧时还听到他们的惨叫声。真是狼心狗肺，恨得老百姓咬牙根子，因为还要种地，等鬼子一走，村里人又把尸体挖出一部分另埋了，那年地里大麻长得比玉米还要粗。

值得纪念的“神枪手”

在这场战斗中，六六六团也牺牲了一部分官兵，村里老百姓就地埋葬了12名官兵。六六六团官兵打鬼子作战勇猛，至今在那里还流传着一位勇士可歌可泣的事迹：那次战斗中，在张家墩北侧一个地堰上的凹坑里独自卧着一名神枪手，战斗中，他不断用冷枪射杀敌人，连续打死了9个日本鬼子，后来部队撤退时他没有得到命令，被日本鬼子包围了。这时，他子弹打光了，面对围上来的鬼子毫不畏惧，端着刺刀，跳出战壕与鬼子刺杀，最后身上中弹壮烈牺牲。此情此景被趴在岭上的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后来，村里人流着泪把他的遗体掩埋了。据埋他的人说，他身体上有七八个大窟窿眼，是被子弹打穿的。村里孙仕信等老人在世时，每到清明节还给这位无名烈士填土烧纸以示悼念。

铁军大帐追歌行 (七)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苏北阜宁——落脚停翅港

(1941年7月10日——1942年底)

1941年7月10日，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自此以后近两个月时间，先后在盐阜地区的高作、北左庄、硕集、羊寨、陈集、刘家舍、周门镇、侂周村、单家港、汪朱集等10余个村镇短暂停留，指挥着反“扫荡”、反顽固派斗争。1941年9月5日，新四军军部进驻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村。

停翅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名。群雁列阵，应时而飞，漫漫天道，昼夜兼程，栉风沐雨，不惧雷电；尤领头之雁，直在阵首，识途辩航，振奋士气，呵护下属，责任在心，披肝沥胆，从不知倦，堪为表率。振翅长飞中，若能有一港湾，稍作停留，落脚一歇，真是一件幸运之事。

新四军军部恰如一领头雁，自反“扫荡”开始，成为标准的“飞行指挥部”，转战转移十数村镇，分秒不歇，也是疲倦不堪，急需一个港湾落落脚。遇上“停翅港”，或是天意。

这里位于阜宁县阜城镇西南17公里处，虽处平地，但地形复杂，池塘四布，芦苇丛生，便于隐蔽；傍倚阜淮公路，交通便捷，是个能攻能守的好地方。新四军军部在此地“停翅”后，中间短暂转移至阜宁县城西北的单家港；1942年3月20日，重进停翅港。军部先后在停翅港及周围村庄共驻扎1年又3个月，直到1942年12月26日，为粉碎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二次大“扫荡”，才撤出停翅港转移到淮南盱眙县的黄花塘镇。

新四军军部在转战盐阜地区、落脚停翅港期间，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就是领导了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刘少奇同志还着重抓了党的思想理论与干部队伍建设，陈毅则重点抓了军队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新四军军部撤出后，日军35师团进驻陈集，修筑了工事。停翅港一带村舍，包括新四军军部驻地在内，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43年3月25日，新四军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张爱萍，亲自指挥部队一举攻下陈集，全歼日军近百人。陈集收复后，因战争未结，环境艰苦，被日军毁坏的新四军军部驻地未能修复。

建国后，阜宁县人民政府在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建了数间纪念馆，竖立了纪念碑，碑前镌刻着张爱萍将军手书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题名，背面碑文记述了新四军军部在停翅港的一段光辉历史。

一、飞行军部多转战，空城之计巧脱险

1941年7月10日晨，刘少奇和陈毅率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主动撤出盐城，当天傍晚时分，来到今建湖县近湖镇（原钟庄乡）东北5公里处的北左庄。当我们来到村里，向老人们询问当年新四军军部旧址时，一位退休干部模样、健康爽朗的老人，立即热情地带领我们找到了旧址所在地，并告诉我们，这片地方建国后改建成了一座粮库。

军部在北左庄一共住了10余天。当时日军正加快向盐城合击，新四军各部的战况报告像雪片样飞到军部，刘少奇和陈毅夜以继日地了解调度情况，随时随地指挥着部队的反“扫荡”作战行动，一派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之气度。即便在以战为主、以反“扫荡”为先的情况下，军部和刘、陈二首长，对原来计划安排好的其他各项工作，都没有忘记照常处理。

7月20日上午，陈毅还按原计划出席了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可是，陈毅的话还没讲完，就接到了军部的紧急电话，请他赶快回军部。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大兵合击盐城；两天后，日军占领了盐城这座空城。

在新四军沿途处处袭扰、沉重打击下，日军一路损兵折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占领了一座空城，气急败坏，狗急跳墙，立即对盐城四周地区展开拉网式“清剿”，寻找新四军军部和主力。他们陆军在地面齐头并进，舰艇在水上横冲直撞，飞机在空中侦察轰炸，一时间，整个盐阜地区枪炮轰鸣，狼烟遍地。

面对日寇疯狂的大“扫荡”，新四军军部不得不撤离北左庄，一再转移各地，先后在周围的刘家舍、侑周村、周门镇、汪朱集等村镇短暂停留。就在此间，陈毅亲自导演和指挥了一出“空城计”。

7月24日，刘少奇和陈毅率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乘汽船从水路转移到北塘河南岸，隐藏在河套中的一个小渔村里。刚刚落下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日寇的3架飞机就呼啸而来，围绕小村庄一带低空盘旋，乱扔炸弹，盲目扫射。就在此时，一位老乡急促地跑来报信：鬼子的汽艇正从西面朝这里开来，离得很近了。看来这里

也不是安全之地。陈毅略一思考，果断地命令赖传珠：“让驾驶员立即把船升火，把电台等紧急装船，必要时请少奇等同志先到船上去，你负责安全保卫！”赖传珠刚要问“那您呢？”只见陈毅已经走到院子中间，对警卫员说：“传令警卫班长带领全班战斗人员和4挺轻机枪，速来见我！”瞬间，警卫班十几名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战士集合完毕，精神抖擞地列队在陈毅面前。陈毅大声说道：“同志们，敌人来势汹汹，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保卫军部，保卫首长的安全！我命令你们，立刻向西跑步前进，选择合适地点，构筑工事，拼死迎敌，决不能让鬼子的汽艇闯进这个河套中来！”战士们嗷嗷叫着：“坚决完成任务，誓死保卫军部！”立即转身前进，迅速冲向前方。陈毅带上两名警卫员，也随即跟着队伍前进。赖传珠急忙上前，欲拦住陈毅；陈毅哪里答应。赖传珠又要跟着同往，陈毅说：“你留下，一定要保护好少奇同志！”

陈毅和战士们刚刚在西面不远的河堤林荫草丛中隐蔽下来，日军的汽艇像一条条凶猛的鳄鱼，扑到了面前。陈毅一声“打！”机枪、步枪、驳克枪向日军喷出了愤怒的子弹，一颗颗手榴弹也在“鳄鱼”的头上身上开了花。日军刹那间被打得落花流水，死得死伤得伤。此时，陈毅见一个日军军官正在驾驶舱中指手划脚地大喊大叫，便命令狙击手：“擒贼先擒王，你把驾驶舱里那个头目给我干掉！”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那个日军军官的脑袋被穿了个血窟窿。狙击手又兴奋地问：“那个驾驶员打不打？”陈毅笑着说：“先不打了，我们没有驾驶员，让他开船回去交差吧！”

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调转船头，狼狈回窜。陈毅从草丛中站起来，刚舒展了一下胳膊，没想到狙击手却给他提意见了：“报告首长，我有意见，为什么不让打死敌人的驾驶员？”

陈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反问：“年轻人，我这次给你们交代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呀？”

“当然是保卫军部，保卫首长呀！”战士毫不含糊地回答。

“那要是把鬼子的驾驶员打死了，他们没人开船，回不去了，会怎么样？”陈



陈毅亲率部队出击

毅又问。

战士们略一思忖，回答：“他们没了退路，肯定会狗急跳墙，冲上岸来与我们拼命了！”

“那你们怎么办？”

“那我们就跟鬼子拼到底，我们新四军战士不怕死，宁愿拼死，也不后退！”战士们把胸膛拍得嘭嘭响。

“鬼子人多，还有后援。我们就这十几个人，万一拼光了，那你们的主要任务谁来完成？”

战士们这才如梦方醒，个个面面相觑。

陈毅哈哈笑着说：“我们刚才跟鬼子真打了，可是耍的却是一出空城计。能把鬼子打跑吓跑才是上策。要是把鬼子的驾驶员也打死了，敌人必然要与我们拼命，那就不是空城计，成了刺刀见红了。我们牺牲了是小事，可是万一军部出了问题，那还了得？我陈毅可吃罪不起哟！”

战士们个个十分钦佩陈毅军长的谋略和对战斗火候的把握，狙击手说：“咱们陈军长赛过三国的军师诸葛亮了！”

陈毅风趣地说：“我可没有孔明先生那么高明。今天这一仗，还是大家英勇奋战的结果嘛！用我们四川人的土话说，就是‘寡妇养儿子——全靠众人啰！’”大家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当陈毅智勇退鬼子，带领战士回到村里时，军部的所有同志一齐拥上前去，迎接他们凯旋归来。刘少奇紧紧握着陈毅的双手，连声说：“陈毅同志，我们大家感谢你，十分感谢你！我和大家一起为你庆功！”

至月底，日军“拉网”的范围越来越缩小，军部机动的范围越来越狭窄，为了防止紧急情况下的意外，保证军部指挥不间断，刘少奇与陈毅商定，两人分开行动。刘少奇由参谋长赖传珠陪同，率直属队与两个连向东北方向活动；陈毅有打游击战的经验，留在当地与敌周旋，领导反“扫荡”斗争。

二、运筹帷幄妙用兵，敌寇扫荡终落空



新四军架起重机枪打击日军

就在军部处境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战局开始出现有利变化。陈毅、刘少奇在反“扫荡”伊始就布下的“敌后之后”的“棋子”——第一师粟裕部开始发挥出重要作用。日军此次大“扫荡”的最早矛头所向和重点所在，是军部和第三师所在地盐城及苏北地区。日军倾巢向北出动后，粟裕用“围魏救赵”之策，指挥所部在苏中地区向日军老窝发动全面进攻，围攻泰兴、泰州之敌，连拔黄桥、古溪数地之日伪据点，打断日军南北交通线，使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首尾不能相顾。日军无奈，只得从盐阜地区抽兵南下，对苏中新四军进行报复。当日寇掉屁股南下时，苏北的新四军第3师等部又在盐阜地区发起反攻，收复阜宁，兵指盐城。日军只得又一个180度大调头，再扑苏北。我军南北紧密配合，避实就虚，专打敌后，如牵犬缰；日军顾此失彼，南北折返，疲于奔命又处处挨打，狼狈不堪，到8月底，已是气数将尽，苟延残喘，只得草率收兵，撤回原防，缩回老巢，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次苏北、苏中反“扫荡”，历时1个多月33天，新四军共作战135次，毙伤俘敌3800余人，其中日军1100多人，击沉、击伤敌汽艇30艘。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此次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一、三两师也伤亡官兵千余人。尤其是军部直属的鲁艺分院200多人，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遭受了重大损失。戏剧系班长叶玲，党总支委员李锐，戏剧系学员方青萍、李馨、季慧、宋莹、姚莲娟、王海纹和记者高静等9名女同志，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为不落入敌人魔掌，她们毅然集体投入皮岔河中，壮烈殉国，这是继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后的又一壮举。英勇牺牲的还有优秀小说家邱东平、剧作家许晴等十几个同志。邱东平到新四军后，在陈毅鼓励下，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从1940年就开始创作反映新四军战斗事迹的长篇小说《在茅山下》，牺牲前5章已经创作完成，开始在《盐阜大众》上连续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赢得了广泛好评。他牺牲后，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部血迹斑斑的手稿，正是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却成了作家的遗作，令人万分痛惜。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新四军军部暂时驻进了阜宁县陈集乡的侏周庄。

时隔70多年，我们来到侏周庄寻访。村里年近八旬的刘登祥老人仍然有着清晰的孩提记忆，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当年新四军军部驻在本村时的情形。他们家房屋稍为宽绰，军部的食堂就设在他们家，刘少奇、陈毅等首长过来就餐时，还时常把一些好吃的让给老人和孩子们吃。战士们经常在他们家前的场地里进行军事训练，投手榴弹，拼刺刀，瞄准射击，卧倒跃起，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嗷嗷叫。原来静谧的小村庄，那时一片热气腾腾，比过年还热闹。

三、孤军奋战十八旅，粉碎清乡战功殊

日寇在集结重兵、对苏北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的同时，调集大批部队，在华中地区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清乡”，这是华中党和新四军面临的另一种形式的更为艰巨而长期的严酷斗争。

日寇的“清乡”与“扫荡”都是对我根据地党政军民的进攻与“围剿”，但又有很大不同。“扫荡”是一种突然性的短时间的军事进攻行动，目的是对我进行突袭性的集中打击，伤我元气。“清乡”则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进攻与剿杀，而且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并以政治为主，目的是达到对其占领区的长期控制。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底，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多。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只是占领了点与线，就是城镇和交通干线，而广大农村仍然为中国军民所

控制。日军在对我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清剿”失败后，为了维持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迫切需要用一种新的办法和对策来进一步控制占领区。1940年12月，日军第13军司令泽田茂到任伊始，就与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部主任晴气庆胤商量控制占领区的治安办法。想来想去，他们竟然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启发，认为可以仿效蒋介石过去在江西对共产党采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做法，实施“清乡工作”，并得到了汪精卫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认可与支持。1941年3月13日，汪伪政权决定组织“清乡委员会”，与伪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并列，汪精卫亲任“委员长”，足见他们对“清乡”的重视。

“清乡”主要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华中地区进行的。由于受其兵力限制，无法对占领区同时开展全面“清乡”，只好分批分期进行，先后在苏南、苏北、苏中、皖北、浙东、太湖东南、上海周围等地进行了20多期“清乡”。其中，对苏南和苏中第4军分区的“清乡”，日伪军出动兵力最多，手段最为全面，持续时间最长，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斗争也最为残酷。

苏南在敌“清乡”中首当其冲。1941年7月初，日伪军出动兵力1万多人，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地区首先进行第1期“清乡”。而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和地方武装总计只有4000余人。敌人来势汹汹，双方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为此，7月3日，当新四军军部还在盐城时，就电示6师：反“清乡”斗争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多打小仗；划区分散游击，使日伪捉摸不定；乘虚进袭敌后据点，牵制敌人；严密防备顽军进袭。

6师18旅按照军部批示，虽然进行了艰巨斗争，但因力量薄弱，经验缺乏，损失严重，陷入被动。8月上旬，他们及时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分区转移对付日伪分区‘清乡’”的基本方针，即在日伪“清乡”时，主力向他区转移，一切人员疏散，转入秘密状态；等“清乡”过后，再插回原地，恢复工作。军部与刘少奇、陈毅等领导认为他们这一方针与做法符合形势与实际，很快予以批准。果然，在实行这一方针后，六师不但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还逐步摸清了敌“清乡”的特点与规律，总结出了一套反“清乡”的对策，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创造了许多屡试不爽的好经验。如用“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对付日伪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主力部队跳出“清乡”区，避其锋芒，以短小精干的武工队袭扰敌人；寻找战机，袭击日伪据点；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封锁线等。他们的成功做法，还为其他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1941年7月到1943年底，日伪先后对苏南进行了7期“清乡”，均被第六师十八旅一一挫败。他们经过长期顽强斗争，不仅坚持了原有地区，而且开辟了新的地区，发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战中，为后来新四军向东南发展奠定了基础。1941年底，当十八旅一部驻在宝应县柳堡村时，村里的女青年“二妹子”夏美英和姐妹们积极动员起来，帮助部队护理伤病员、洗衣被、做军鞋。在新四军的宣传教育下，夏美英和父亲、哥哥、嫂嫂、大姐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又带领几个姑娘一起加入了新四军。全国解放后，根据“二妹子”夏美英等人的故事创作的电影《柳堡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一曲《九九艳阳天》的优美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革命歌曲经典。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末代主席秦德纯

石绍庆



秦德纯，字绍文，沂水县人。

1912年考入国民政府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又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察哈尔政府主席、北平市长等职。1948年10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兼任青岛市长。1949年5月青岛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也宣告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终结，秦德纯成为了国民党政权正式任命的最后一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出身耕读世家

秦德纯的十一世祖在明代万历年间，从青州乐安县（今山东广饶县）逃荒至沂水县城东三华里处的埠东村。秦家世代耕读，传到秦德纯祖父秦仙桥时，正值清咸丰同治年间，东捻军一部窜扰至沂水，秦仙桥乃组织乡团，保卫闾里，城郊近乡赖以安宁。事平后，沂水县知县要保举其军功，秦仙桥力辞再三，最后乃提出请求，增加沂水县的秀才名额。经过上级核定，沂水县的秀才名额由16名增加到18名。秦德纯的叔祖秦奎良，系举人出身，曾担任延庆州知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同光绪帝逃出北京，路经延庆州，秦奎良慌忙出迎，将眷属房舍腾给慈禧，签押房腾给光绪，但延庆州地瘠民贫，无法赶办宴席，仅以鸡蛋挂面侍奉慈禧及光绪。因对嫔妃及侍从等招待不周，招致怨言。罗惇胤《庚子国变记》记载：“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太后慰遣之。”慈禧由西安回銮后，秦奎良即罢官居家。

秦德纯父亲兄弟三人，大伯父秦鉴藻考试不第，居家养亲，办乡里公益。二伯父秦鉴湖于光绪五年中举，分发山西，历任夏县、孟县、寿阳知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寿阳知县的秦鉴湖因在义和团运动中境内英国教士锁押虐待被清政府革职。民国成立后，秦鉴湖回到沂水，曾任沂水商会会长，著有《剡溪诗文集》。秦德纯在济南陆军小学读书时，寒暑假回乡常随侍左右。秦德纯的父亲秦鉴堂为邑增生，三次赴乡试未中。科举废除后，开办学堂，秦鉴堂被推为沂水县勤学所所长，清末民初沂水县的读书人多出自秦鉴堂门下。秦德纯兄弟姊妹共4人，大哥秦德经，为宣统元年拔贡，分发山西省司法。二哥秦德纶，中学毕业后在沂水县办理教育事业。

系统的军官教育

秦德纯八岁时正式入学，启蒙老师是沂水西乡的田兰生先生，秦德纯主持北平市政府时，特聘田兰生为顾问。后跟随沂水县城西龙家圈的

高尚志学习，高尚志后来曾担任沂水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秦德纯与同乡前往济南投考陆军小学，在报名体检阶段，其他同考的学生均未通过，只有秦德纯一人合格获得参加笔试资格，并最终第11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济南陆军小学第三期学员。入学之后，秦德纯勤奋努力，孜孜不倦，在三个月后学校组织的甄别考试中，取得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宣统三年（1911年），秦德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济南陆军小学毕业。暑假过后，秦德纯即和沂水县同学、济南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牛元峰、杨焕彩一同前往北京报考陆军第一中学。牛元峰，1935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〇九师师长，奉命率部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11月20日在直罗镇一线被红军包围，战败身亡。杨焕彩，抗战爆发后，曾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苏鲁豫边游击挺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等职。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京陆军第一中学暂时停办，秦德纯由北京返回济南，时值山东省酝酿独立，秦德纯便参加了公推巡抚孙宝琦为都督的运动。1912年，秦德纯由陆军中学毕业，被分发到陆军第十师第三十七团第一营入伍，当时同在一营入伍的同学有刘峙、熊式辉、祝绍周等。入伍六个月后，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训，秦德纯与熊式辉一同被编入步兵第二连，每次月考，不是熊式辉第一，就是秦德纯第一。

1916年夏，秦德纯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山东陆军第五师第十八团担任学兵连教官。后与陆军小学时期同学薄子明一同到周村参加了护国军，担任总部幕僚兼代营长，之后又到济南军官讲习所担任战术教官。1918年夏天，陆军大学招生，秦德纯顺利考取，于1919年入全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第六期学习。在陆大期间，秦德纯系统学习了军事战略、战术、战史、马术、图上作业、沙盘作业等，同时兼修国际公法、外国语、微积分等，为其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陆军大学规定，如果战争爆发，学生要回原来所在部队。秦德纯所在的师为皖系，师长眼看大势已去，为给国家保存力量，便向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投降。吴佩孚命令他们缴枪，秦德纯说“我又没学过缴枪”，就又回到陆军大学。毕业前，秦德纯曾受孙传芳的参谋长陈席珍邀请赴孙传芳处，适张作霖的代表程国瑞与孙传芳联络，秦德纯便又被孙传芳委派与程国瑞一同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沟通感情。在沈阳期间，秦德纯先后三次与张作霖面谈。回到北京后，孙传芳委派秦德纯为总部参谋，驻京办事。



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二十九军将领（自左至右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1922年冬天，秦德纯由陆军大学毕业，到第二十四师四十七旅任上校参谋长。1925年，担任国民第二军第五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抵达山东，孙良诚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为省政府委员。1930年秦德纯任二十九军总参议。1932年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5年6月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0月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11月任北平政府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忍辱签订“秦土协定”

1935年，已经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1935年5月30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送该师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

日军立即抓住借口，宣称4人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被“青龙刀威胁”，“还不给食物和寝具”。6月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时任察哈尔省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第一三二师参谋长撤职；惩办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并限五日答复。6月12日，秦德纯赶往北平向何应钦汇报。后土肥原悍然声称：“关东军将要宋（哲元）主席去职，调走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及惩办肇事人员。”同时，驻热河之日伪军已于6月9日开始侵扰察哈尔境，各地均有冲突，情势严重。6月18日，行政院会议，为避免事态扩大，决定将宋哲元主席免职，而以秦德纯代理察哈尔主席。6月22日，察省主席秦德纯、委员萧振瀛到北平，共同商讨张北事件。6月23日，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松井，与秦德纯、萧振瀛、程克、张允荣、陈觉生会谈张北事件，要求撤退驻军及察省党部。

6月23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此时，秦德纯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卧在沙发上。秦德纯随即请示南京。

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各委员：皆可酌情办理。结果对日军提出的要求，蒋介石出于“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则此时应以保全国脉为先，而牺牲一切为最后之处置也。”对日宗旨，除“宋哲元谢罪”一项改为“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外，秦德纯均予答应。27日上午，秦德纯赴日使馆陆军武官室会晤土肥原，递交了书面答复。其内容如下：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责任人免职；二、“将被认为对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

“秦土协定”的签订，让秦德纯备感屈辱，也坚定了抗日的决心。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直面“七七事变”

1935年初秋夏之交，秦德纯奉召庐山面见蒋介石，报告华北态势。蒋当场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将军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1935年10月，秦德纯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11月任北平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37年五六月间，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并采用离间手段，有意将二十九军分化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并认为秦德纯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地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秦德纯惟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1937年的7月7日晚，秦德纯召集北平的文化名流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20余人，汇报形势并商讨应对办法。晚八点多，驻北平日武官松井根据嘉田之报告，以电话通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说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丢了一名士兵，有人见他进了宛平城，他们要进城搜查。秦当即回答：“宛平是中国领土，日军越界进入演习已经违反国际公法，进入宛平地区的日军要全部退出。出于两国友谊，可以等到天亮，由我军警代为寻找，一经找到，立即送还。”嗣后，松井复以电话告诉秦德纯，谓如不许日军入城，即武装卫护队伍进入，同时宛平驻军及第四区专员公署亦以电话向秦报告，谓日军增兵至四五百名，对宛平县城取包围攻势，盼速交涉制止。

到了八日凌晨三点多，驻守宛平城的吉星文报告驻丰台日军一个营，山炮四门，机关枪一连向宛平城移动。秦德纯敏感地意识到事态非常，他当即在电话中对吉星文



自左至右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宋子文、秦德纯

说：“保卫国家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军人的荣誉。务必晓喻全团官兵，奋斗牺牲，卢沟桥宛平城就是吾军坟墓，国家领土一尺一寸都不可让以他人。”秦又在电话中嘱咐吉星文：“敌不开枪，我亦不开枪，等敌开枪并进入我最佳射击距离，我则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天亮以后，日军先是要求外交官进城，后又要求武官进城，都被吉星文等拒绝，于是日军就向我开炮射击。吉星文按秦德纯的指示，给日军以猛烈打击。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幕。

8日，秦德纯与松井进行交涉，至深夜，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中国军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于九日上午九时接防。随后，秦德纯电报国民党中央：齐晚由津方增来敌之大部，集结卢沟桥附近，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彼方迭次前来接洽，并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结，经商议结果，双方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前线兵力在各自撤收中，除仍妥慎戒备，迨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10日，蒋介石电复北平秦德纯市长、天津张自忠市长、河北省冯治安主席等，指示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方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28日，日军攻陷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伤亡2000余人，北苑黄寺亦被占领。秦德纯与宋哲元、冯治安等离北平赴保定，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北平沦陷后，第二十九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秦德纯任总参议。1938年3月调任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驻西安，巡察陕甘晋军队。1940年春调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上将副总监。1943年11月任兵役部政务次长，从事征兵工作。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出席东京审判

1946年5月，秦德纯接到东京军事法庭的通知，邀请其出庭作证。秦当即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并向秦德纯提出出庭作证的两项最重要任务：一是证明日本是侵略中国的国家；二是证明土肥原是执行侵略政策最重要的主持人。5月10日，秦德纯同王冷斋一起乘飞机前往日本。到达东京后，秦德纯即着手准备证词，并交由远东军事法庭译成英、日文字交给各国审判法官及被告。

秦德纯出庭作证四天，从1946年7月22日至25日。7月22日，秦德纯向法庭提出证词。证词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日本侵略华北，包括察北事件及所谓“秦土协定”之签订、日人对于冀察当局之胁迫等；其二，“七七事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语言为英文与日文，秦德纯之法庭证词译成英文后，由国际检察局的莫罗上校宣读。莫罗称：“尊敬的法庭，我知道这些证词都是十分严肃的，是一份由中华民国政府提交的真实、可靠的陈述。”

接着，被告辩护律师在四天时间内相继登场，围绕察北事件、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华北驻军演习之条约根据、中国军队是否均服从中央政府之命令、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原因、土肥原与“九一八事变”之关系以及田中奏折之真伪问题等，轮番向秦德纯提问，频频刁难。当时《中央日报》以《远东国际战罪法庭，秦德纯作有力答辩，土肥原为侵略阴谋主使者》为题、《申报》以《辩护人一再进攻，秦将军单骑舌战》为题，形象地报道了法庭激辩的情形。

对于辩护方的诘问，对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如察北事件，日本对冀察当局的压



迫以及分裂华北的阴谋、“七七事变”的爆发及与日方的交涉，秦德纯的回答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对于其未经历的事件，如“九一八事变”及其与土肥原的关系，其回答略显含糊。如围绕“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展开交叉质证，辩护方问：世人所称之“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是否为天津市长程克与北宁路局长陈觉生斡旋之结果？秦德纯回答：所谓“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实无其事，此为德纯奉中央命令与土肥原协商之暂时解决事件办法，其时程克与陈觉生系任交涉之翻译。在秦德纯的出庭证词中，根本没有出现“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或“秦土协定”以及“协定”之类的字眼。律师的用意，是想用“协定”一词，将秦德纯描述的“察北事件”定义为事件后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察北地区，以及察北地区其他主权的丧失，都说成是日军与中方协议的结果。秦德纯否定了“协定”一词。

根据公开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等史料，以今天的观点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秦德纯的证词是有理有据的，不仅没有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言辞，更没有“差点被轰下台”的坊间传闻，作为证人的秦德纯其表现可以说是近乎完美。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化妆逃往青岛，中途在寿光被解放军俘虏。国民党中央乃于1948年10月任命秦德纯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此时，除青岛外山东各地均已解放，秦德纯只得在上海设立了山东省政府办事处，1949年3月他才到青岛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但时间不长，1949年3月底，秦德纯即由青岛返回南京，继续担任国防部次长职务，并电请中央以山东省政府秘书长杨展云代理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1949年5月，在秦德纯撤离青岛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青岛、即墨的“青即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1949年8月，秦德纯随国民党撤往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政府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1959年退役。1963年9月7日，秦德纯病逝于台北，终年70岁，著有《秦德纯回忆录》《海噬谈往》等。



萧衍：爱做和尚的皇帝

我爱看历史



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个马上皇帝，也是个喜欢做和尚的皇帝，这就是有名的梁武帝萧衍。萧衍字叔达，兰陵中都里人。他原来是南朝齐的官员，后来逼齐的皇帝“禅让”，自己建立了梁。萧衍做皇帝时间长达48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

出众的谋略

464年的一天，萧顺之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父母为他起了个小名，叫练儿。孩子长到六七岁时，该上学了，父亲又给他起了个学名——萧衍，字叔达。

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东晋淮阴县令萧整的后代。他父亲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好友被称为“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朓、范云等。不过，这八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七个人无法相比的。

萧衍刚做官时在卫将军王俭手下。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于是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不久又被提升为参军。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然后复官，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

公元493年，齐武帝病重时，当时的大臣王融想在武帝去世后立自己喜欢的皇帝，以便控制政权。后来事情败露，王融被入狱赐死。

齐武帝去世后，新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理政务，对大臣的劝谏也不接受。掌权的大臣萧鸾很生气，打算把他废掉，另立皇帝。在和萧衍他们商议时，萧衍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废立难免会遭到众王爷的反对。”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爷没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萧衍说：“这个随王其实徒有虚名，并无什么真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和另外一个，这两个也是无能之辈，贪图金钱富贵，到时候只要一封信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那个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的。”

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赞同，于是照他们商议的执行，先是废立了皇帝，自己掌握朝政大权，三个月之后，萧鸾干脆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齐明帝。萧鸾做皇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封建阳县男，采邑三百户。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在以后的几年中，萧衍的军事、政治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南齐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韬光养晦

齐明帝以篡得位，总害怕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子孙起来推翻他。为了根绝后患，他对高、武子孙大开杀戒。齐高帝十九子中除十一人早死外，其余八人都是被他杀死的；齐武帝二十三子中除七人早死外，其余十六人也全部死在他的手里。

齐明帝不但屠戮高、武子孙，对一些功臣宿将也横加猜忌，晚年尤甚。功臣宿将人人自危，纷纷寻找出路。498年4月，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起兵反抗齐明帝，几天之中聚众十万人，一直攻打到建康附近。这次叛乱虽然很快便被平定，但也给齐明帝以很大打击。不久，他便在忧惧中死去。

处在变乱之秋，萧衍不但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在政治上也有出色的表现。他深谙韬晦之略，处处藏其锋芒，以避免刻薄寡恩的齐明帝的猜忌。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功劳归于齐明帝的英明决策和属下将士的英勇善战。每当得胜回朝，他总是主动上交兵权，遣散部曲。齐明帝性喜节俭，萧衍也刻意仿效。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有事出门时从不招摇，经常乘坐简陋的牛车。几年的韬光养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萧衍的品德才干，得到了朝野士大夫、文臣武将们的普遍赞誉，齐明帝也对他另眼看待。因此，尽管齐明帝猜忌群臣，专事诛戮，却始终对他恩宠如一，视为心腹。

495年，北魏孝文帝乘南齐内乱，率兵大举南伐，派大将刘昶、王肃进攻司州（今河南信阳）。刘昶是宋文帝的第九个儿子，曾任徐州刺史。465年，宋前废帝刘子业诬刘昶谋反，派兵讨伐。刘昶武装反抗失败，被迫丢弃家小，只携一名爱妾逃往北魏。因他学识渊博，颇有文采，北魏很重视他，妻以公主，拜为侍中、征南将军。

王肃的父亲王奂，曾任南齐雍州刺史。493年，王奂因事触怒齐武帝，满门被诛杀，只有王肃得以逃脱，奔往北魏。王肃出身世家大族，熟悉典章制度。北魏孝文帝对他很重视，多次亲自召见他，商讨军国大事。北魏的各种典章制度，大多出自王肃之手。他在孝文帝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此时任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

刘、王二人身为南朝叛将而见重于北魏，自然对孝文帝感恩戴德，矢志效忠。两人率大军20万，将义阳城（今河南信阳北）围得水泄不通。魏军昼夜攻打，义阳危在旦夕。得知义阳危机，齐明帝萧鸾先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领兵迎战。听到北魏军队分兵攻打义阳后，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可是，当部队行进到距义阳一百里的地方时，听说北魏军队人强马壮，齐军将领们都畏惧魏军的强大，再也不敢前进了。

这时，萧衍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担任先锋。萧衍率军连夜进发。他避开大路，专取捷径，很快抵达义阳城外的贤首山，然后命令士兵将旗帜插满了山上山下。此地距魏军阵地仅有几里路程，但齐军抵达时，魏军根本没有发觉。等到天一亮，魏军突然发现贤首山上遍插齐军旗帜，因为不明齐军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而义阳城中的齐军看到后，以为重兵已经赶到给他们解围来了，于是士气大增。司州刺史萧诞下令打开城门，亲率齐军扑向魏军大寨，同时顺风放火。萧衍见状，也率山上齐军冲下山来。萧衍亲自上阵，摇旗擂鼓助威，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敌。魏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王肃、刘昶弹压不住，只好退走。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清点战利品时，一个士兵发现了一箱文件，连忙献给主将。这些文件中有一封北魏孝文帝刚刚发来的敕书，敕书上写道：“听说齐军中有一个名叫萧衍的将军，非常善于用兵，你们如果和他相遇，一定要倍加小心，最好是坚壁不战，等我率大军赶来。如果上天保佑，擒得此人，则江南不难平定。”这个消息很快在齐军中传播开来。从此，萧衍的声威大振。萧衍也因战功而升任太子中庶子。

497年10月，北魏孝武帝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雍州（今湖北襄阳）。雍州刺史曹武率众抵抗，屡为魏军所败。齐明帝连忙命萧衍和右军司马张稷赴援。接着，又命度支尚书崔慧景总督雍州诸军。他们到达襄阳时，雍州的五个郡已被魏军攻陷。次年三月，齐军进驻邓城（今湖北襄樊市北）。北魏孝文帝率十余万魏军突然杀到。萧衍和崔慧景领兵与北魏军作战，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被北魏的几万铁骑兵包围。萧衍知道城中粮草和枪械缺乏，恐生兵变，就对崔慧景说：“为防万一，我们还是趁敌人立足未稳，鼓舞士气杀出重围为上策。”崔慧景认为此时主动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没有同意萧衍的意见。

魏军集结完毕，向齐军展开冲击。崔慧景见魏军势众，便想引军退走。萧衍扣马极谏，崔慧景坚持不从，命士卒打开南门，向襄阳方向逃走。其他各部见统帅溜了，也纷纷逃散。在经过离邓城不远的闹沟时，败兵争先抢渡，魏军乘势掩杀，齐军死亡无数。萧衍见各路齐军逃走，只得整齐队伍，且战且走，也向襄阳方向退去。尽管兵败，部队伤亡甚大，萧衍却仍然全师而归。这次战役后，齐明帝以萧衍为辅国将军，代理雍州刺史。这是永泰三年（498年）七月的事。过了几天，齐明帝便病死了。

萧衍到任后，积极经营，实力迅速膨胀，从此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为他几年后东下灭齐、建立梁朝奠定了基础。

废帝登基

齐明帝萧鸾死后，他的儿子萧宝卷即位。萧宝卷治国无术，却很残忍，杀掉了很多大臣，对于一些功臣也大加杀戮。他猜疑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刺史萧衍对朝廷图谋不轨，遂派人前往行刺。不料，行刺者未照旨行事，反把此事告诉了萧衍。萧衍逐渐和他对立起来。

500年11月，萧衍召集部将说，主上（指萧宝卷）昏聩暴虐，罪恶超过商纣王，我决定和大家一起废除他，另立新帝。随即建立大本营，集结部众，拥兵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船舰3000多艘，积极准备推翻齐帝。萧宝卷得知萧衍举兵起事的消息，即派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率军3000人在上任途经江陵（今属湖北）时，会合西郎中史萧颖胄袭击雍州，消灭萧衍。

萧衍决定以计谋分化敌军阵营，逼反萧颖胄。首先，他派参军王天虎到江陵（今属湖北），向荆州各处散发传单，声言：“刘山阳此次西上，要一并剿灭荆、雍二州。”各处得到传单后，皆惶恐不安，人心大乱。不久，刘山阳来到巴陵（今湖南岳阳）。萧衍又命王天虎前往荆州，随身携带他写给萧颖胄及其弟萧颖达的两封书信。王天虎走后，萧衍对自己的舅舅张弘策说：“前些日子，我派王天虎到荆州，很多人都接到了我的书信，信中所言甚详。现在我写给萧颖胄兄弟的两封信，信中却没有具体内容。信中只是说：‘以王天虎口信为准。’其实我什么也没对王天虎说，王天虎到荆州后当然什么也就说不出什么来。而王天虎又和萧颖胄的关系甚好。这样，荆州的人们必然怀疑萧颖胄和王天虎隐瞒了什么，因而生疑。刘山阳也必然对萧颖胄有所怀疑。萧颖胄进退两难，必然中我的计谋。此计若成，便是以两封空函平定一个州啊！”

果然不出萧衍所料，刘山阳进到江安（今湖北公安）后，听到了萧衍与萧颖胄合谋的传言后，心生疑窦，就不再前进了。萧颖胄闻讯大惧，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召集众僚佐商议对策。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说：“萧雍州（指萧衍）蓄养士马，非只一日。江陵人素来畏惧襄阳人，又众寡不低，与其相抗，必败无疑。不如杀掉刘山阳，与雍州共同起事，拥立新天子以号令诸侯。”咨议参军柳忱也劝萧颖胄说：“主上昏庸残暴，京城百官人人自危。我们有幸远在外藩，所以才能苟延今日。如今朝廷命令我们讨伐雍州，是想借机削弱我们。当时萧令君（指萧懿）以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如此卓著，后来却为昏君所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况且雍州兵精将广，萧使君（指萧衍）英才盖世，必非刘山阳所能敌。假若雍州兵马打败刘山阳，我们就要受到刘山阳的牵连而被朝廷怪罪，到那时进退失据，事情可就难办了。”萧颖达也劝萧颖胄接受席阐文的意见。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萧颖胄打定主意，决心跟随萧衍起事。

不久，萧颖胄等用计谋斩刘山阳，领众与萧衍会合。至12月底，上庸（今湖北竹山）太守韦叡，华山（今湖北宜城）太守康绚等亦率众响应萧衍。

501年正月，萧衍率军自雍州出发。萧衍起兵的消息传来，上雍太守韦睿马上率领自己所部2000人马兼程赶赴襄阳。萧衍见韦睿率众前来，非常高兴：“往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有君辅佐，吾大事必成！”

沟口成副冯道根正在家中办理母亲丧事。听到萧衍起兵的消息，他对众亲戚说：“金革夺礼，古人不避。不能囿于礼法，固守三年之丧。我决定前去投奔萧雍州，建功立业！”于是，率领能够作战的所有乡人子弟奔赴襄阳。

华山太守康绚，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憺听到萧衍起兵的消息，也都率众响应。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萧衍得力的战将。

三月，萧衍等人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江陵即位，是为齐和帝。至九月，先后攻占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汉口（今湖北武汉汉口）、江州（今江西九江），进在建康附近。十月，萧衍等军向建康发动进攻。十二月，攻入宫城。

此时，齐内部仍有奸臣进谗言，说事到如此完全是文武大臣的过错，怂恿萧宝卷大开杀戒。这使征虏将军王珍国异常愤恨，暗中派心腹给萧衍送去一个明镜，表

示心迹。王珍国与其他大臣带兵夜入皇宫，杀死萧宝卷，然后将他的头颅送出，献给萧衍。萧宝卷只做了短短两年皇帝，死时年仅十九岁。萧衍贬他为东昏侯，谥号炀。

萧衍在攻占首都建康后，派兵四处征讨，各地的官员纷纷投降归顺。萧衍拥戴和帝，消灭了萧宝卷，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也因此升任大司马。萧衍虽然大权在握，但更想废和帝自己做皇帝。原来的好友沈约知道他的心事，于是委婉地向他提起此事，第一次时萧衍装糊涂，推辞过去了；第二次提起时，萧衍犹豫片刻，说了句“让我想想再说吧”，后来就答应了。

沈约又告知了范云，两人都同意拥立萧衍做皇帝。范云和沈约写信给和帝的中领军夏侯祥，要他逼迫和帝禅让帝位给萧衍。同时，萧衍的弟弟、荆州刺史也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为萧衍称帝大造舆论。等和帝的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又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众臣117人，再次上书称臣，请求萧衍早日登极称帝。公元502年四月，萧衍正式在都城的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跪拜朝贺，改国号为梁，即梁武帝。然后，萧衍派人给和帝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和帝死后，萧衍说他暴病而死，追认为“和帝”。又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丧礼，将他葬在安陵。

显著的政绩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改革时弊，励精图治，调整政策，缓和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梁书·武帝纪赞》说他：“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他勤于政务，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冬天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即位不久，他便按佛教的规矩办事。他只吃素食，不吃肉食，连祭祀天地祖宗和开宴会的时候，也叫摆上素菜，不准用牲畜。他不讲究吃穿，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也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二年，居室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什么摆设。后宫贵妃以下的宫女侍从，穿的衣服长不及地，极为简朴。他从不饮酒，平时也不听音乐。

在政治方面，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他还分遣使者，巡视各郡，监视地方官吏，惩办贪污，选用贤能。他下令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并命于州、县、郡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搜罗和推荐人才。他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农业方面，他曾经实行籍田制。这虽然是皇帝表面耕田的形式，但在当时不无鼓励农耕的作用。他曾下令“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良种有乏，亦加贷恤”。流移他乡的农民，允许他们回乡，恢复原有的田宅。荒田废宅没入为公田后，除官府已经垦种者外，都拿来分给农民，禁止豪强占用公田，只是

“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此例”。萧梁的屯田，超过宋、齐两代。屯田主要是北边荆、秦、司、豫等州，利用官田荒地，进行兵屯。在赋税方面，也多次减免租调或“三调”（即按户征收的调粟或调布。因当时租、调需由田、桑、屋宅三者估出资产，而确定应交的数目，所以租调也称“三调”或“三课”），有时免去孤贫之家当年的三调，有逃亡他乡以后复业者，“蠲课五年，停其徭役”。又曾继续“土断”（在东晋、南朝废除侨置郡县，使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户口，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整理户籍。

他也和很多皇帝一样，猜疑心很重，害怕开国功臣们夺他的皇位。在功臣当中，应属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范云不久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格外照顾，特别是他的次子萧综和六弟萧宏，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并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个人还谋划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被处死。萧衍的女儿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宏也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被封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七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疏远了。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给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即斩衰，一种生麻布做成的简单衣服）三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

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这两件事后，萧衍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



革命的熔炉 艺术的堡垒

——从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到“鲁艺宣大”

华楠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下称“鲁艺”）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当年冬和次年春，在山东各地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抗日的烽火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标志着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山东的宣传文化工作，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于1939年1月决定创办山东鲁迅艺术学校。

在艰苦的敌后办学，“鲁艺”把教学和战斗紧紧相连，发扬延安“抗大”理论联系实际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良



1939年，山东纵队宣传部与鲁迅艺术学校部分同志合影。左起：贾霁、曹秉衡、卓明、×××；中排左起：徐怀、于平；后排左起：王绍洛、×××、陈金凯、刘宗卓、于鹏、贺伟、王衡、于波

好学风，创造性地发挥了既是学校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的作用。1940年1月1日，“鲁艺”与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亦称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山东分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合编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鲁艺宣大”或“宣大”），成为山东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劲旅。

筹 办

为办好“鲁艺”，山纵领导选调王绍洛任校长。绍洛很早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曾在鲁迅亲自领导下，发起创办上海“MK木刻研究会”，用木刻画作武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抗战开始后，他在山东昌邑和胶东部队先后组织过“抗战剧团”和“国防剧团”，并任五支队宣传队长，在山东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1939年1月下旬，山纵政委黎玉同绍洛谈话时说：“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都有很大发展，但是文学艺术方面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强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现在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创办山东鲁迅艺术学校。这个学校要根据敌后的环境，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榜样，发扬‘抗大’的办校精神，通过办校，把山东省的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并请他们当教员。‘鲁艺’的组成，以山纵宣传大队为基础，再从各方面调入。你任校长，华楠任政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黎玉强调，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鼓励绍洛把“鲁艺”办好。山纵政治部主任江华也和他谈了话。同时，黎玉和江华也先后找我谈话。他们说：“你是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派你去就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抗大’理论联系实际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还指示：“鲁艺”不仅要在抗日的宣传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作用，还要为部队培养和输送人才。

山纵政治部宣传大队，在山东纵队成立时组建，由山纵各支队调来的宣传文化干部和优秀宣传员约40多人组成，我任大队长，下设三个分队，其中一个女同志分队。根据山纵首长指示，宣传大队的任务是，一方面对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一方面为部队输送宣传文化干部。当时的主要活动有：帮助连队的宣传文化活动，同时到附近村庄作社会调查，进行集市宣传和小型演出，组织自卫团（民兵）和其他群众团体。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演唱过《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延安颂》等歌曲。

“鲁艺”的筹办工作是在沂水县朱蔚村的一座旧庙里进行的，条件相当简陋，但参加筹办工作的同志热情很高，配合也很默契。办学千头万绪，特别重要的一环是聘请教员，这方面绍洛贡献很大。山东的画家、音乐家、戏剧家，许多都和绍洛熟悉，其中不少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有些人的老家就在沂蒙山区，如杨荆石的老家在蒙阴，他也是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员，当时正担任地方政府的区大队长（后为蒙阴县长）。绍洛首先找到他，转达了山纵领导关于创建“鲁艺”的决定和想请他任教的意见，他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筹办，多方聘请教员。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数百里，先后去了沂水、莱芜、日照、临沂等县；又冒着危险穿越敌占区，陆续请到上海新华艺专毕业的尚奎斋、邵锡吾，上海美专毕业的元尧、臧仲文、申雨晴等同志，他们大都是上海“MK木刻研究会”的成员，受过鲁迅的教诲，是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进步艺术家。教员中，还有绍洛的妻子王路丁，她文艺素养高，擅长戏剧和化妆。同时，纵队首长又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和所属部队中，选调了政治和艺术素养较高的贾霁、徐忻、李泰、马刺、谷洪、鲁石榴等同志来校任教，组成了一支革命化、专业化很强的教师队伍。

“鲁艺”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逐渐配齐后，经过酝酿讨论和山纵首长批准，确定了“鲁艺”的教育方针、建制、机构、招生标准和教学计划等。

“鲁艺”属山纵政治部领导，设校长和政治协理员，下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杨荆石、尚奎斋分别任主任，分戏剧、音乐、绘画三个系（后又增加了文学系）。为适应敌后环境，学校既按教学内容分系，又按军事编制设了四个区队，区队以下分班。男学员按教学系划分编成三个区队，后设的文学系编入戏剧系区队。女学员单编一个区队。专业课以系为单位进行。

“鲁艺”的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山纵宣传大队；二是山纵各支队选调的优秀青年，包括宣传文化干部、文化教员、宣传员等；三是从进步学生中考试录取。入学考试比较简单，只写一篇抗战题材的短文，主要是口试和审查简历。

教材由教员选编，以他们积累的资料为基础，结合敌后情况和学员水平编写，教务处统一审定，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改补充。教材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办校的其他筹备工作，也是逐步充实和完善的。

开 学

1939年3月27日，“鲁艺”在沂水县朱蔚村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开学典礼。黎玉政委作了《鲁迅艺术学校诞生的三个历史环境与它的三个任务》的报告，他指出“鲁艺”产生的三个历史环境是：一、产生在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中；二、产生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里，“艺术学校的‘母亲’便是这位游击战争”；三、在山东还是空前的产物。“鲁艺”的三个历史任务是：一、艺术学校要服从整个抗战活动，要创造出抗战中的艺术堡垒；二、把如何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充分表现在艺术作品里；三、不仅要造就一批担任文化娱乐的干部，而且还要造就许多新的艺术家。最后，他号召：“一切服从战争，在战争中学习”。

开学不久，“鲁艺”就由朱蔚村移到山纵和山东分局所在地王庄以东的宅科村和麦坡村。这两个村各只有几十户人家，两山相夹，小河环绕，环境幽静，群众基础好，教员、干部和学员都分散住在群众家中。学员的年龄多在16至18岁之间，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20岁左右。他们思想纯正，朝气蓬勃，好学上进，革命热情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员约150多人，加上教员、干部和工作人员，“鲁艺”共约200人。

开学后，师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地上课学习。没有教室，就在场院树荫下听课，没有桌凳，就双膝当桌，砖石为凳。后来条件有所改善，每个学员发了一块约50厘米长、40厘米宽、1至2厘米厚的木板，坐下时放在腿上当课桌，部分学员还发了小凳子。专业学习的困难更多些，但也难不住“鲁艺”的师生们。绘画系，上油画课没有油画笔和画布，就用铅笔、水彩笔和纸代替。音乐系，没有钢琴就用月琴和胡琴代替。戏剧系，没有舞台，缺少演出道具，学校就发动师生在村西头建起露天舞台，自制道具，边学习边演出文艺节目。师生们自豪地说：画笔和乐谱是刀枪，排练场是战场，“鲁艺”的课堂就是山东抗日文艺的家乡。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又活泼。没有节假日，也不休星期天。早上起床后就集合上操，跑步爬山。值日生留在家中，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开学不久，在早操后增加了队列训练。训练一结束，学员们就在教员的指导下练发音、练唱歌。清晨的山谷中到处充满了嘹亮的歌声，到处可见排练的身影，小溪两边回荡着欢声笑语，连水中的鱼儿也兴奋得来回穿梭，活跃起来。吃饭前大家要集合唱歌，大多数教员和学员

一起吃饭，个别岁数大的，由学员轮换帮他们打饭。“鲁艺”每天上午有一节课，课后讨论和实习。中午没有午休，晚饭后或做群众工作，或排练文艺节目，不外出活动时大都在校自习。学校实行晚点名制度，领导对学员的学习、生活和作风进行讲评。熄灯前，各班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心得体会，并对教学提出意见，校领导和教员经常分头参加，和学员们一起讨论。夜间，校干部坚持查铺查哨制度，师生们轮流站岗放哨。

“鲁艺”的戏剧系也叫表演系，教员有谷洪、贾霁、马刺、鲁石榴、王路丁等。他们主要是通过排练节目来上课，经常是一字一句地教台词，手把手地教表演，亲身示范怎样理解角色和剧本的情节。排练的节目有《月上东山》《农村曲》《送郎上前线》《儿童团长抓汉奸》等。

音乐系教员有徐忻、元尧、申雨晴等。他们以创作反映抗日军民英勇杀敌、踊跃支前、团结战斗为主题，教学员乐理、乐谱的基本知识和创作要领。教员申雨晴，利用他娴熟的小提琴技艺，进行对比教学，核准发音，收到良好效果。当时创作的歌词大都取材于学员亲身经历或熟悉的抗战实践，乐曲尽量套用脍炙人口的民间小调，大家称之为“旧瓶装新酒”，通俗易懂，乡土味浓，唱起来备感亲切。

绘画系教员有臧仲文、邵锡吾等。他们基本以绘制宣传画和素描方式进行教学，有时也学油画和山水画，还教写各种美术字和如何书写大字标语。绘画系老教师臧仲文画的大幅毛主席像，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成为绘画系进行教学的主要作品之一。王绍洛发挥他的木刻专长，选了基础比较好的学员传授木刻艺术，如王建楚、师创就是当时被挑去的。绍洛讲课深入浅出，从细微处阐述木刻艺术的精髓，对如何选木料、制刀和构图，怎样掌握刀法和印制，都作了详细的讲解和示范；为了教会学员一种技法，一堂课就是半天，有时甚至延续至深夜，直到学员领会掌握为止。他和学员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木刻作品，举办过木刻展览，有些作品还被山东分局办的《大众日报》选用。

开学不久，在教学中我们意识到，没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革命的文艺宣传工作很难发展。为了加强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经上级批准，学校增设了文学系。教员有李泰、贾霁等。他们讲授高尔基的《母亲》等有代表性的作品和通俗的文艺理论，如普罗文学史等。对《月上东山》等剧本，还专门结合排练，进行现场教学。教员经常出题目，启发学员从写小故事或几个人物开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反复修改，认真进行讨论和总结，创作出一些反映现实斗争的戏剧和小说。

政治理论学习是“鲁艺”的重要课程，每周安排约三个半天，先讲课后讨论。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社会发展史、近代史、党史、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概论等。

为了加强学员的军事训练，上级调军事教员王一醒（后兼任行政管理的大队长）来校统一组织军训。内容有队列教练、行军、宿营、识别地图、判别方向方位和利用地形地物，还有投掷手榴弹等课目。训练中特别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步调一致，着重培养学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性，增强集体观念和纪律性。

“鲁艺”的学习和生活虽然艰苦，但在纵队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广大师生精神饱满，信心百倍，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气氛。

搞好伙食也是办校的一件大事。校总务处主任尚奎斋和行政大队长王一醒亲自抓，党支部和俱乐部经济委员会也经常检查。学校建立了帮厨制度，关心炊事员的生活。炊事班的同志积极想办法调剂伙食，如地瓜干煮稀饭，自制炉具烤地瓜，把高粱煎饼烤得焦些，保证把高粱小米饭做熟等。隔一段时间还做一些大饼和馒头，两三个星期吃一次水饺改善生活。那时每人每天菜金只有几分钱，炊事班的辛勤劳

动和精心烹调，得到了校领导和师生们的热情赞扬。

为了更好地贯彻黎玉同志“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指示，学校组织了两项活动。一是帮助附近部队和机关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二是在驻地周围村庄做群众工作。

反“扫荡”

1939年6月初，日寇2万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了反“扫荡”的需要，分局和纵队领导决定将“鲁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绍洛带领，和岸堤干校一起活动。他们在绍洛带领下，配发了手榴弹、大刀和少量枪支，学习游击战知识，积极进行宣传，帮助群众抢收小麦，坚壁清野，坚定群众反“扫荡”必胜的信心。这个期间，他们继续积累素材，创作出一批军民合作、民众参战、揭露日伪军侵略罪行的小戏，采用说大鼓、唱渔鼓、打洋琴等街头活动方式，露天演出，并大量选用民谣和小调，编写新歌小曲，向群众教唱。同时，还用中日文字书写瓦解敌伪军的标语，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张贴和散发，绘制反“扫荡”连环画，流动宣传；协助地方政府，发展抗日群众组织，建立情报网，进行敌后侦察。他们还重新排练上演了《送郎上前线》等节目，对沂蒙山区掀起妻送郎、父送子的参军热潮起了推动作用。另一部分恢复为山纵政治部宣传大队，由我带领随山纵机关行动。大家听指挥、守纪律。反“扫荡”开始不久，山纵领导为了便于作战，紧缩机关，决定“宣大”暂时疏散。“宣大”一部分男队员分配到连队参加战斗，大部分队员分为若干组，到几个群众基础较好的山村，发动群众，进行反“扫荡”。有的组直接协助自卫团打游击，保护群众转移；有的组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开办各种训练班；有的组协助县区政府动员参军，建立基层政权。女同志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就女扮男装，如张建（张洁民）、王衡等到蒙阴县黄庄区、“七区委”驻地青冶行村一带，剃光了头，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白天身披蓑衣，手持鞭子，跟着群众上山放羊，晚上回村帮助做群众工作，组织青年妇女和儿童开展抗日宣传。她们严格遵守纪律，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从未摘过老百姓的果子吃，也不乱动村里的东西。这些都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群众也把八路姑娘当作自家人。当年参加过妇女识字班的许多老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些队员的名字。队员们出色的群众工作，推动了当地青年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

在上级领导下，山东军民不到3个月就胜利粉碎了日寇的大“扫荡”。1939年6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朱瑞率领精干的领导机关来到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8月，一纵机关和山纵机关合并（山纵番号仍保留）。

9月初，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山纵宣传大队、山东战地服务团陆续集合到沂水县的罗家官庄和劳坡一带。“鲁艺”恢复办校，王绍洛仍为校长，徐忻为政治协理员（我在反“扫荡”中已调任黎玉的秘书）。山纵宣传大队，先后由吴少卿、许冠群为大队长。战地服务团主任为李微冬、指导员为易茵。这时，一纵首长决定召开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以“鲁艺”为主，宣传大队和战地服务团参加。

这里简要说一下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它于1938年秋，由山东军政干部学校第三期抽调部分学员组成，约30人，归山东分局领导，对外称八路军山东战地服务团。李进任主任，下设戏剧、民运、宣传、总务4个科。不久，李微冬接替李进，易茵（女）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曾到沂水县城和东里店、刘家店子等地，向沂水县政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东北军五十七军及社会各界进行宣传演出，广泛开展群众

工作。反“扫荡”中，他们组成若干小组，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盘哨，帮助恢复村政权和抗日团体。

经过反“扫荡”，3个文艺团体的同志都得到了很大锻炼，作出了贡献。许多同志把生动感人的斗争事迹，记录在手册里，描绘在画页上，谱写在歌曲中，为宣传抗日积累了丰富素材。

9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召开了“庆祝鲁南反‘扫荡’伟大胜利军民联欢大会”。会前，“鲁艺”日夜奋战，迅速创作出话剧《麻雀战》《铜墙铁壁》《鬼子落网记》，“莲花落”《新小放牛》，歌曲《反“扫荡”进行曲》，大鼓词《敌退我追》和在旧歌曲上填新词等大批作品。邵锡吾、王建楚等美术系的师生还突击创作了反“扫荡”连环画、漫画和标语，使会场内外充满了革命的战斗气氛。山纵宣传大队和战地服务团也加紧排演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被糟蹋的人》《流寇队长》和京剧《打渔杀家》等节目。筹办演出的同志们废寝忘食地背台词，练合唱，排节目，决心为庆祝大会增光添彩。庆祝大会上，一纵和分局的首长作了总结讲话，表扬了“鲁艺”等3个文艺团体在反“扫荡”中严守纪律、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出色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不断进步。这次演出，节目精彩，质量很高，观众掌声不断，台下还不时发出“再来一个”的呼声，整个会场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取得了圆满成功。

合 编

为了更好地发挥“鲁艺”和纵队宣传大队、山东分局战地服务团的作用，1939年冬，分局和纵队领导研究决定，将这3个文艺团体合编。关于合编后的名称，当时朱瑞、黎玉等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和征求意见，考虑到一方面应保留“鲁艺”的名称、教学性质和培养干部的任务，一方面应加强部队和群众的宣传工作，延续“宣大”的任务，把“鲁艺”的办校精神和学风融进工作中去，并充分体现“五湖四海”的原则，认为命名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比较合适（简称“鲁艺宣大”或“宣大”）。1940年1月1日，在罗家官庄召开了合编大会。会上，朱瑞宣布“八路军第一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成立，王绍洛为大队长，李微冬为教导员，并作



1940年，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部分同志在沂蒙山区青驼寺合影。

了动员讲话。朱瑞指示合编后的“鲁艺宣大”仍保留原“鲁艺”的性质，继续为完成历史赋予的三个任务而奋斗。合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除留在“鲁艺宣大”工作外，许多同志被分配到各支队、军分区做宣传工作或到战斗部队。

合编后的“宣大”约有120人。下设6个专业组：编导组，赵忠负责；戏剧组，王剑魂、于大水负责；音乐组，亓尧负责；标语漫画组，邵锡吾、王建楚、柳特负责；民运组，杨裕进负责；服务组，张志普、林化石负责。原“鲁艺”大部分教员按专业分到各组，继续坚持“在于中学，在学中干”的优良学风，把教学课程有计划地贯穿到各项宣传活动中去。1940年7月，教导员李微冬调走，由丁铸铁（丁志刚）接任。

“宣大”还设有“鲁迅剧团”。亓尧、赵忠担任正副主任，外号叫“汽灯大王”的林化石任后台主任。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农村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红灯》《老太婆的觉悟》《武四醉酒》《万仙会》《二郎神大闹佛堂》《亲家母顶嘴》等。王绍洛在《红灯》剧中担任主角兼导演。《生产大合唱》演出时，巴立华演“牛”，贺伟演“鸡”，毕永畅演“羊”，李素、刘枫唱的“二月里来好春光”等主题歌，音色清脆，感情真挚，受到了朱瑞等领导同志和群众的好评。杨星华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节目（也叫“武老二”）生动而又群众化，反映现实快，打动人心，从领导干部到战士和农民都喜欢听，赞不绝口。

1941年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谢有法率巡视团赴清河地区三旅和胶东地区五旅和五支队巡视工作。这时“宣大”一分为二：一队由王绍洛率领，随巡视团活动，这个队比较精干，约50多人，队长王剑魂，副队长赵忠，支部书记贺伟。二队由教导员丁铸铁率领，约70多人，队长亓尧，剧团主任侯心一，支部书记李素，随纵队政治部活动。

一队到渤海和胶东后，主要活动有：帮助渤海的“耀南剧团”和胶东的“国防剧团”“孩子剧团”等提高业务水平，分别从戏剧、表演、舞台美术、舞蹈、创作和绘画等方面向这几个剧团进行讲解与辅导；同时主动向他们学习地方剧目，加强协作配合，进一步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当时渤海和胶东的部队比较分散，巡视团和“宣大”多是夜间行军，拂晓宿营，最多时一夜行军140里，有些女同志和生病的同志跟不上，就组织两个身体壮的帮助一个身体弱的坚持行军。每到一地，立即投入演出，最多时一个月演出31场，队员们的肚子饿了、嗓子哑了，就找点地瓜和小米稀饭充饥润喉，接着又投入紧张的演出。这期间，“宣大”还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排演了曹禺的话剧《雷雨》，这既是为了加强文艺宣传工作，又是有意识地通过这次排演，提高全体队员的业务水平。那时排演这样大型而又难度高的话剧，困难很多。队员们文化基础差，社会知识面窄，有的甚至识字很少，王绍洛等从讲戏入手，对剧中人物反复分析、启发对角色的理解，并在台词、表演、造型等方面给演员示范指导。林化石还带领几个同志反复钻研，创造性地用图形与实物相结合、铁板喻鸣与变光灯相结合，使舞台布景、电闪雷鸣的效果逼真。《雷雨》上演后，指战员和驻地群众评价高、印象深。主演《雷雨》的巴立华（饰演周朴园）、刘枫（饰演鲁妈）、赵忠（饰演鲁贵）、辛颖（饰演四凤）、王剑魂（饰演大少爷）、高波（饰演繁漪）、吴宏训（饰演周萍）、徐国良（饰演鲁大海）八位演员，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八大名星”。

二队在鲁中、滨海活动。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农村曲》《亲家母顶嘴》《生产大合唱》等。颇受群众欢迎的是大秧歌，它不受场地限制，演出方便，化妆和服装都简单，锣鼓一响，二胡一拉，秧歌就扭起来了，中间还可穿插一些小节目，演出活动很灵便，不仅在台上，还经常利用场院和集市展开。演出人手不够时，当地妇

救会、识字班就来支援，形成军民联欢的动人场面。

1942年1月，“宣大”一队回沂蒙山区和二队会合，王绍洛和丁铸铁仍任大队长、教导员，亓尧任副大队长。这时“宣大”除演出和做地方工作外，也编写和演出了一些新的节目。纵队领导对此很重视，几乎每次排演都来审查和讲评。有一次排演新编写的话剧《新中国的母亲》，主要情节是：八路军回民支队神出鬼没，打得日军东跑西窜。后来，日军把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的母亲抓去，严刑拷打，马母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趁敌人不注意自尽而死。日本特务机关长发现后立即脱下军帽，向马母行90度鞠躬礼。随即主题歌唱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新中国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头……”幕落前，日本军官一直在鞠躬。那天，正好朱瑞政委来看排演，戏刚散，他就来到后台，高声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接着他向集合起来的全体同志说：“写这样的剧本，起码说明觉悟不高，阶级界限模糊！敌人对一位革命烈士会那么折服？！剧的结尾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宣大”受到朱瑞这样严厉的批评，还是合编以来的头一次，领导和队员们情绪都比较紧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员们还没有起床，朱瑞又来到队员驻地，等集合后，他说：“昨天我批评的方法欠妥，语言激动，请大家原谅。其实，你们的戏前面部分还是蛮好的，只是最后部分改一改就行了。戏不可能一下子就写得很好，要反复修改嘛！你们演这场戏，还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只要吸取这次经验教训，政治上再强些，戏会演得更好，更受战士和群众欢迎。”

1942年8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以山纵机关的大部分为基础组成鲁中军区机关。“宣大”随后改名为鲁中军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仍简称“鲁艺宣大”或“宣大”）。经过精兵简政，这时“宣大”只有50多人。不久王绍洛调离，丁铸铁任大队长兼教导员，亓尧任副大队长。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刘庆泗，副分队长巴立华；二分队长张志普，副分队长任开民；三分队长侯心一，副分队长杨星华。日本投降前，丁铸铁调离，亓尧代理大队长，王林亭任副大队长兼指导员。这期间，“宣大”的人数虽然少了，但是质量更高了。特别是经过整风，“宣大”着重学习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和业务得到了很大提高，文艺宣传工作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一时期，“宣大”编演了京剧《王佐断臂》《七擒孟获》《辞曹归汉》（又名《万里寻兄》）；演出了话剧《英雄好汉》《巧计》《雨过天晴》《水落石出》《不要杀他》《气壮山河》，活报剧《沂城大合唱》《战斗英雄曹世范》《血汗交流》《抓壮丁》《大战沂水城》《抗战真光荣》，歌剧《吴满友》《一场风波》，杨星华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南北岱崮保卫战》《智取袁家城子》《二曹大闹蒙阴城》和多种歌舞。这些节目，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各次战斗，而且语言生动，富有风趣，打动人心，深受欢迎。丁铸铁自作自演的诗朗诵，如《祝贺山东省战工会成立》《献给山东纵队宣传工作会议》等也颇具特色，影响较大。“宣大”演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及时紧密地配合作战。如，甲子山战役后，丁铸铁搜集当地反动会道门“万仙会”的罪恶材料，很快就编演了《万仙会》《二郎神大闹佛堂》；攻克沂水城不几天，就编演了《大战沂水城》《沂城大合唱》；打下袁家城子，马上编演了两幕话剧《智取袁家城子》；解放蒙阴后，杨星华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和“武老二”《二曹大闹蒙阴城》，及时和群众见了面，很受欢迎；解放博山不久，又编演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盗匪世界》等等。这说明，只有坚决贯彻《讲话》精神，满腔热忱地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时刻和革命战士、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才能使宣传文化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宣大”参加的战斗很多。如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解放沂水、蒙阴、博山、

张店、益都……沂蒙地区的每个大的作战行动几乎都有“宣大”的足迹。“宣大”参加战斗的情况是少部分队员留守驻地，大部分分成三批投入战斗，一批下连队，甚至跟突击队冲锋；二批随指挥所活动；三批跟后勤做兵站工作，救护伤员，押送俘虏，做瓦解敌军工作。“宣大”参加战斗，除帮助连队和后勤工作外，还下大功夫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并做战地采访报道。在第三次讨吴战役中，丁铸铁很快创作了反映军民共同作战的大型歌舞活报剧《血汗交流》。攻打沂水城时，刘庆泗等和作战突击队一起冲锋杀敌，并及时给《前卫报》写稿；柳特、魏瑞珍等不顾恶臭，清洗和处理日军尸体，参加瓦解敌军工作；侯心一等同志组织群众分粮分油，抢送抢运。围歼日军草野清大队时，柳特、任开民、吴宏训、孟宪忠等，在敌工部门统一领导下，和“反战同盟”的板谷、进野、小岛全之助等人一起，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宣大”也很重视开展群众工作。丁铸铁于1942年带部分队员到沂水县刘家城子帮助减租减息，和群众结下深厚的友谊。徐国良帮助洪河村建立剧团，排练《归队》等节目。于大水在村里养病时，帮助群众排练《铁牛与病鸭》《老乡上冬学》等小戏剧。此外，还做了一些改造地方旧戏班的工作，一边学习地方戏《锣鼓牌子》《九龙摆尾》《打十二根花棍》《拉洋片》等传统技艺，一边帮他们排练抗战内容的新节目。

解放战争时期，鲁中军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和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宣大”也就随之改编为第八纵队和二十六军文工团（另一部分同志渡海去东北野战军）。名称虽然变了，但“鲁艺”的优良传统仍然保持和发扬了下来。

（注：本文作者为开国少将，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社长等职）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七)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画展喜庆港澳回归

1997年6月19日，之先收到来自深圳市的“庆祝香港回归书画展”组委会的通知，邀请1-2名书画家（每人一件作品）参加书画展。之先除自己精心画一幅山水画外，又请市书协副主席高庆荣创作一幅书法作品，与他一起去参加，然后将两件作品一起寄至深圳，供统一装裱。

按通知要求，6月25日，之先和庆荣二人一起乘飞机赶赴深圳。会务由覃总（女）负责安排。报到和开会地点为《深圳商报》办公楼。从报到情况看，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共有40多人。其中著名的书画家有：王学仲（1925-2013），山东滕县人。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时，曾得徐悲鸿指教。历任天津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书协副主席。

周韶华（1929-），山东荣城人。1950年毕业于中南文艺学院美术院。历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湖北文联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委。擅国画山水，是新时期中国画突变型的代表，推动了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代表作《黄河魂》。

刘文西（1933-），浙江嵊县人。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任西安美院教授、美协陕西分会主席。擅国画人物，代表作《祖孙四代》《在毛主席身边》。是西安画派代表人物。

其夫人陈光健，擅工笔人物，代表作《慈母手中线》。

刘大为（1945-），祖籍山东诸城，由内蒙古考入中央美院1978级研究生班。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1998年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2008



年任中国美协主席。坚持现实主义，兼及工笔及半工半简笔法。代表作《马背上的民族》《晚风》等。

傅小石（1932—）国画大师傅抱石之子。毕业于山东艺专，又就读于中央美院。后因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受迫害，致半身偏瘫，三肢失灵，以顽强的毅力改用左手作画。其“左笔”人物画深受海内外观众的赞赏。是江苏省美术馆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

7月1日，正当全国人民欢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庆回归书画展》开幕了。这是深圳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领导及文化界、书画界、企业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开幕式，到会讲话并参加剪彩。市民们听说来了些重量级的画家，也蜂拥而至，展厅门口车排长龙，人如潮涌，全市为之轰动。在展厅里，人们为周韶华画的大江大河的宏伟气势所震惊，为刘文西人物画的陕北高原的西北风所陶醉，对皮之先的齐鲁画派的北方山水也颇感兴趣。

这座新兴的城市，对这批久仰大名画家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刘文西始终着一身中山装，炎热的天却戴着制服帽子，大腹便便却很爱跳舞；周韶华画有气势，人也豪爽，把盏时非茅台不饮；傅小石因“文革”受害，半身瘫痪，坐着轮椅仍赶到会上……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香港的回归，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于7月1日正式进驻香港执行防务任务。这支部队隶属中央军委，由陆、海、空三军组成，部署在香港14个营区。书画家们主动要求到营房去拥军。部队闻讯后于7月3日派来一辆大客车，将30多名书画家接到在港岛中环营区的总部。驻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将军和政委等领导亲自出面接待，并安排在综合性文化中心的大厅里作画、写字。艺术家们怀着真挚的敬爱之情挥毫泼墨，大显身手，有不少觉得三尺、四尺不够味，干脆推出六尺、八尺的大幅巨作，官兵们围上来观看，都拍手叫好。临别时一再挽留，再多画两天。

与会者们对深圳这座新崛起的城市感到很好奇，渴望看看市容市貌。大会领导理解大家的心情，安排一天观光。大家先登上高69层的地王大厦，鸟瞰全市，在旋转大楼上吃一顿饭；又到文化主题公园（世界之窗），观看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比萨斜塔、金字塔等世界各地的缩微景观……最后又乘船到珠海、澳门兜了一个圈。

1999年10月，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由徐悲鸿纪念馆、珠海市政协、澳门东方画院，香港蒙妮坦集团主办的“皮之先皮威画展”在珠海博物馆举行。共展出皮之先以泰山、黄山、桂林山水为题材的山水画60余件，皮威山水画60余件。广州军区副政委高天正、珠海市政协主席张耀宗，香港著名人士郑明明、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为画展开幕剪彩。高天正将军题词祝贺：“群芳独艳”。

1999年，之先有作品在海口参展，其概况《海口晚报》11月25日头版有报道：

11月23日，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携徐悲鸿作品60余件莅琼，参加海口“徐悲鸿艺术大展及亚奥中国名家书画翡翠珠宝精品拍卖会”。这次由海南亚奥国际拍卖公司和市文体局主办的“艺术大展”展出徐悲鸿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60余件，有国画、油画、写生素描作品及有关照片和资料。

与大展同时举行的还有中国名家书画翡翠珠宝精品拍卖会，展出295件名家书画（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吴昌硕、黄宾虹、关山月、王学仲、刘大为、杨之光……皮之先等，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岭南、浙江五大流派）。拍卖会于29日开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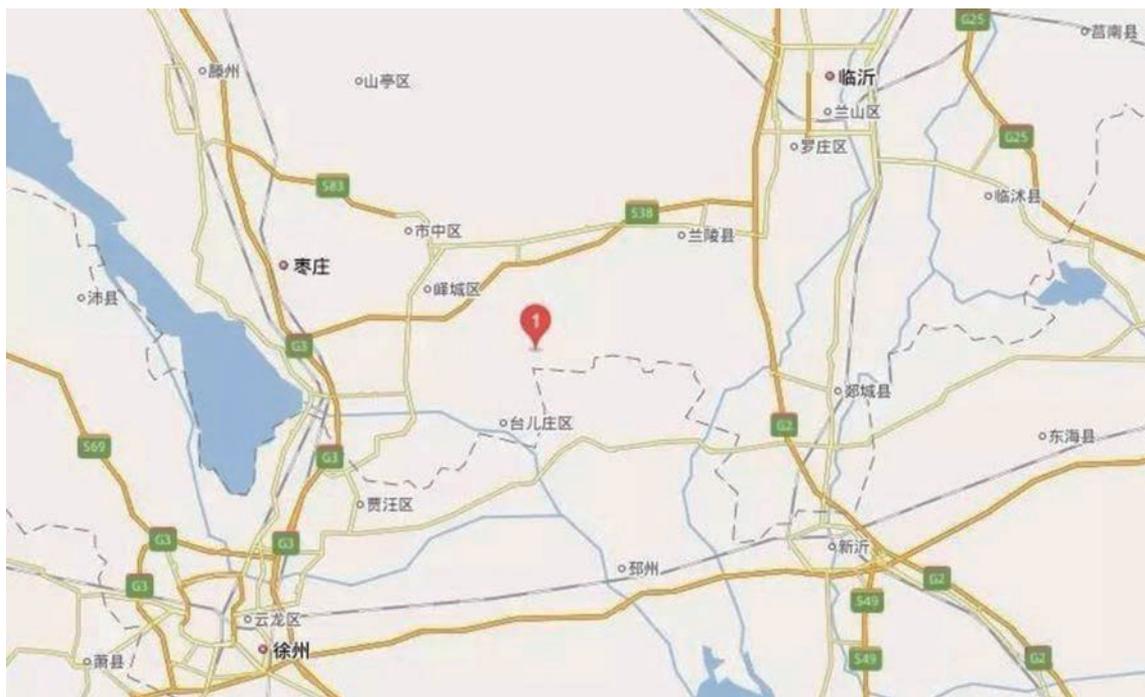
展览开幕式在文华大酒店举行，有省委副书记王原宏、市委副书记符兴、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等参加。

陶墩阻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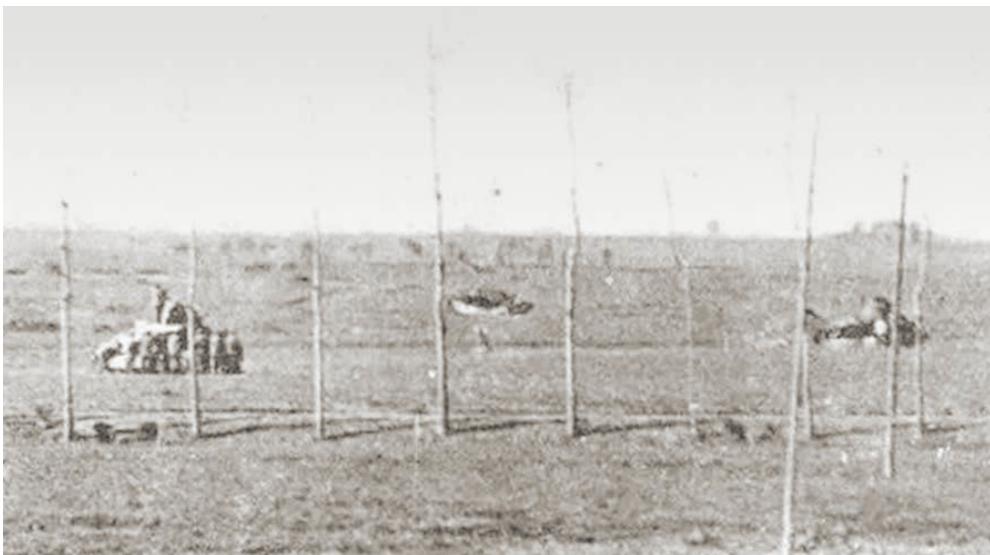
抗战军魂

台儿庄大捷后，1938年4月12日，日军增兵，卷土重来，再度发起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出电示：盘踞在峰县日军有再犯台儿庄之企图，命令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以铁路运送抵达台儿庄，下车后立即到作字沟集结，向向城之日军发起进攻。另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利国驿下车，配合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阻击由韩庄进攻的日军。此时，于学忠部正在固镇休整，接到命令后，受任台儿庄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的于学忠（孙连仲为总指挥）立即率部乘车北上。分别于16日、17日抵达目的地。

于学忠首先命令第三三九旅旅长梁忠武率领第六七八团抵达利国驿支援川军，自己率领主力直奔台儿庄。抵达韩庄之时，川军已与日军对峙多日，于学忠18日赶到，立即与孙震商讨作战方案，提出了以攻代守的战术，命梁忠武旅长率领第三三九旅第六七八团协同川军主动出击，向盘踞在韩庄火车站的日军攻击。



陶墩、底阁地理位置



中国军队击毁的
日军坦克

当夜，第六七八团与川军便奇袭日军据点。连续突破日军的三道防线，官兵们用机枪和手榴弹开路，冲进敌阵，挥起大刀英勇拼杀，一度攻占了火车站。后因日军援军猛力反扑，官兵们只好撤回原来阵地坚守。韩庄战斗打响后，于学忠连夜赶赴台儿庄。与孙连仲商讨作战事宜，于学忠部立即布防于陶墩、底阁、杨楼一线。

4月20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约3000余人，向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发起猛烈攻击。守军第一一四师奋力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下午3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守军第六八四团再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见从正面很难突破，就以6辆坦克掩护大部兵力由晁村、大庄子迂回包围了陶墩。下午，于学忠见白天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很容易发挥，为了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作战，解陶墩之围，他与第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长商量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晚上，他命令所属部队出击，寻找日军目标，给予坚决打击。晚上10点半，第三四二旅第六八三团向大庄子的日军发动袭击。同时，第三四〇旅的一个营也采取夜间攻势作战，由河湾向底阁、杨楼之敌发动进攻。第三三七旅的六七三团向侯宅、刘庄日军发起袭击，各部经过一夜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21日拂晓，第六八三团的官兵们勇猛冲杀到老宅子、大庄子，日军拼命顽抗，但是，该团官兵坚决多次攻击，终于占领了两个村庄。残敌只好向东北方向的刘庄逃走。该团官兵除了用一部分兵力追歼逃敌外，集中主力乘胜又向围攻陶墩的日军发动攻击。扼守陶墩的第六八四团从里向外打，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日军狼狈向大刘庄逃去。天亮后，日军收拾残余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又进行了反击，第六八三团又退回了大庄子阵地固守。

上午10许，日军援军来到，他们先以远程炮火猛烈轰击陶墩阵地。陶墩村子的民房几乎全部被炮火炸毁起火。阵地官兵也有一些伤亡。日军轰击了半个小时后，便集中了六七百日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扑过来。扼守阵地的第六八四团的官兵们沉着冷静，当日军接近阵地时，突然开枪、开炮，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日军坦克，有的坦克被炸起火，日本步兵吓的转身而逃。勇士们冲出战壕，追杀日军，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击。从上午10时到下午6时，中国守军共打退了日军4次进攻。晚上，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伤亡惨重，第六八四团团长牺牲，指挥乏人，只好退出阵地，转移到马庄坚守。这时，左翼阵地河湾阵地也被日军占领。为了确保贾家埠阵地，牟中珩师长立即调六八〇团两个营前来增援，并命令第六八四团集结于燕子井附近，从速整顿，准备再战。两天战斗该师伤亡官兵1000余人。

22日拂晓，日军部骑炮联合一个联队的兵力，沿台枣路南犯。行进到丁家庄、朱家庄附近时，发现中国守军第六七四团阵地，就用猛烈炮火轰击阵地，接着就以坦克掩护步兵向阵地扑了过来。

当日军靠近时，中国守军突然开火，第六七四团团团长张儒彬率领官兵奋勇杀敌，激战竟日，牟中珩师长为了防止日军的包围，遂改守马庄、平滩、潭庄、堡子、崔家圩之线。但是，在以后的战斗中，堡子一度被日军占领。为了夺回该村，第六八三团第二营营长崔鹤鸣率领6连多次反攻，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斗中，崔营长腿部负伤，为了不当俘虏，他毅然开枪自杀，壮烈殉国。6连长王中陶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终于将该村收复。但是，日军仍然不断发动攻势，在危机时刻，于学忠亲自率领大刀队来到阵前，指挥作战。这时，卢汉率领第六十军来到五圣堂一带，归于学忠指挥。第六十军为法国装备，武器精良，云南人虽然不像北方人那样身材高大，但是战斗勇敢，士气高昂。卢军的到来，为第一一三师周光熙部右翼解除了危险，官兵精神为之一振，乘机收复了黄墩、小顾庄。

22日下午2时，1000多日军向甘露寺的第一一四师柿子园、冯水湖阵地进攻，敌人先以炮火猛烈轰击，而后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接近。中国守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不断打退日军的进攻。后来，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守军阵地多处被炸毁。因日军炮火过于猛烈，该团三营长李殿忠以下200多名官兵伤亡，阵地被日军攻克。河湾为重要阵地，师长牟中珩命令第六八〇团团团长于学道夺回该村。

当晚10时许，于学道率领部队组织进攻，双方在村内展开拉锯战，激战到拂晓，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该团被迫撤回。24日上午10时许，日军5000余人，配属5门火炮向大庄子以南的罗庄阵地发起攻击。罗庄仅有第六七九团的一个连守备，该连官兵虽然勇猛拼杀，多次打退日军，终因敌众我寡，全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罗庄被日军占领。

25日下午4时，敌人集中七八门大炮，首先向贾家埠阵地轰击3小时，而后千余日军向该阵地猛扑过来。第六八〇团守军奋起迎敌，重创日军，激战到晚上8时许，贾家埠阵地被突破。这时，预备队已经用完，敌人乘机向两翼扩展。为了防止日军突破防线，双方往返肉搏，形成激烈的争夺战。师长牟中珩命令第六八〇团抽出力量支援贾家埠。因援军来迟，守军大部牺牲。该阵地失陷。

于学忠得知贾家埠是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的阵地，兄弟两人虽然关系很密切，在军队一起几十年。但是，上了战场面对民族仇敌，于学忠在电话中告诉牟中珩：“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忠要枪毙自己兄弟的事，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战斗士气。于学道奉命率部，乘日军立足未稳，于晚上10点左右，打响了收复贾家埠的战斗。经过一夜的奋力拼杀，战斗中，于学道不幸负伤，一营长代理团长继续进攻，这时贾家埠已经收复大部，日军仅据守着村北边的两座碉堡。这一战斗，第六八〇团伤亡600余人。

26日，敌我在贾家埠形成对峙，日军占据碉堡用火不断进攻，第六八〇团官兵浴血奋战，致死不退，激战到下午5时，千余日军也向贾家埠增援，因该团损失惨重，遂撤出战斗。

日军占领贾家埠后，继续以主力分别向兰城店和邵庄进犯。进犯兰城店的日军大部被歼灭，进攻邵庄的日军以5辆坦克为掩护，加上邵庄守军单薄，战斗不久，被日军占领。27日夜3时，第六八三团移住杨家庙，协同第六八四团反攻邵庄，经过多次攻击，日军伤亡惨重，退居在南端一座碉堡内顽抗，激战到天亮，形成对峙。为了夺回邵庄，牟中珩命令旅长李荫坡率领第六七九团接替邵庄、小集第六八四团的防务，该团撤到杨家庙附近准备策应。

28日早4时，第六七九团向杨家庙北的日军发起攻击。第三四〇旅长扈先梅率领部队冲锋，与日军激战3小时，日军不支，开始动摇。这时，扈先梅虽然负伤，可仍坚持指挥战斗，后又因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因兵力不足，邵庄难以夺回，于学忠命令部队向左延伸，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熙调整部署，第六七七团占领江苏省邳州市张楼镇、大黄庄、小黄庄，第三三七旅占领石桥、尚庄、涛沟桥之线。为了减轻第六十军的压力，5月2日，于学忠命令第一一三师进行夜间反击，第三三七旅袭击堡子、崔家圩，第六七七团协助第一一四师袭击邵庄，上述部队均于当天午夜1时发起战斗，毙敌百余人，攻占堡子、崔家圩。

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4日，第五十一军奉命占领运河西岸，固守台儿庄车站、后新闻之线。据此，于学忠命令第一一三师占领黄楼左至土庄运河南岸阵地，以一部守备台儿庄。第六七八团归还原建制；命令第一一四师占领台儿庄车站、后新闻沿运河两岸阵地，并于金家庄、巫山、插花庙一带，占领进攻阵地。两师迅速占领阵地后，虽然不断进行炮战，但是中日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处在对峙状态。

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官兵，寄身锋刃，为国效命，奋战沙场，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于学忠不仅严令部队，不准放弃寸土，还曾率领敢死队上阵杀敌，在战斗中，该军4名旅长死伤3名，团长死伤7名，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缴获火炮30余门，击毁坦克20余辆，缴获、击毁汽车70多辆，击落、击伤敌机数架。沉重地打击日军，阻止了日军南下，掩护大军集中和撤退，受到了第五战区的传谕嘉奖。



第51军的机枪阵地

兰陵县塔山遗迹探考

田乐峰



兰陵县城的塔山，现已成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的公园。山虽不高不大，但它却是这座县城具有象征意义的山。塔山沉积的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探究和发掘。

塔山名称的探究

塔山，也叫塔子山，有关此处遗迹的来历目前只有口头相传，文字记载的较少。据地质部门勘查，这里是近河岸的一处天然低丘，后经人工堆积，制高点海拔78.8米，整座山的组成由9处高低不同的山丘彼此相连，合称塔子山。正因为有这9处山丘的存在，所以原称“九顶铁塔莲花山”。9个山头绿围翠绕状似雄狮卧居，因此而有“狮峰山”的别称。现几处土丘的痕迹仍依稀可辨。为啥有这些小丘，又有何作用？其真正的来历没有记载，也少有人知。现据兰陵县的一些史料考证，以及原塔山观中道人的叙述，谈一下愚思拙见。

“塔”，是佛教的文化符号，是“佛塔”的简称。此处名为“九顶铁塔莲花山”，应该是与佛教相关的。塔的最初之意就是为供奉埋葬佛祖和高僧的佛骨（舍利）之用。后来也用来供奉佛像、收藏佛经、保存僧人遗体。埋葬僧人的地方就称为“塔”，而并非就要有塔形建筑物。另莲花也是与佛教相关的，莲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莲”就是“佛”的象征。佛教将许多美好圣洁的事物，以莲

花作比喻，以莲花为代表。那么，“九”除了具有其他数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和顺序以外，还常表示“多”的意思。《素问·三部九侯论》中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认为“九”是最高数，超过九，就要进一位，又回到“一”了。表示自然界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向有“九九归一”之说，因此来讲，塔子山应该是古代佛教的一处塔林。

兰陵县所处的区域，历史上佛教、道教对这里都有很大影响，特别与佛教的渊源极深，位于县城以北20千米处的郎公寺，是山东境内建立最早的佛寺。佛教的传播，以宋代影响最大。宋代芙蓉道楷（1043~1118），北宋禅僧，青原下十一世、洞山嫡传云居道膺下第六世高僧，世人尊为曹洞宗第八世。兰陵县人，生于县城附近的芙蓉山下，现存有宋代芙蓉道楷的碑刻塔铭。据《五灯会元》记载：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沂州人，俗姓崔。自幼初学道术隐居于伊阳山中，得辟谷之术，后悟其非，弃而习佛，游京师，因背诵《法华经》而得度于术台寺。31岁游浙江白云山，拜谒投子义青禅师得法。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道楷禅师离开投子，一度回到故乡沂州，应道俗之请，弘法于沂州仙洞山，后又居京师天宁寺。先后住持洛阳之招提、郟州之大阳山、随州之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等刹。

宋大观初年，开封府尹李孝寿上奏朝廷，谓道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褒显”。徽宗闻其名，崇宁三年（1104年），召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赐紫衣及“定照禅师”之号。道楷以衣非佛制，却而不受，帝怒，黥而流放淄州。第二年，朝廷收回成命，取消了对道楷的处罚。1113年道楷率弟子僧众从淄州一路南下，途经沂州时，受地方长官和家乡父老竭力挽留，落脚于故乡芙蓉湖畔，即现在的兰陵县城以南地区，过去这里是一片湖泊沼泽，人称芙蓉湖。道楷于芙蓉山建寺，后称“兴化寺”，继续弘传佛法，在家乡修禅布道。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在家乡做出了一桩影响极大的举动，他带领僧人等兴修水利，开渠引芙蓉湖水入沭河，使涝洼湿地变成了千顷良田，造福当地百姓。道楷那时在国内德高望重，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购湖田，修庙宇，吸引了国内众多僧人弟子，聚集于此。

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赐以“华严禅寺”一额，后又赐名“兴化寺”。道楷于翌年五月入寂，世寿76。世称芙蓉道楷。塔山上唐时就有禅林寺，当时紧临着芙蓉兴化寺。此处地势高，有沭河环绕，背山面水。正是埋葬高僧遗骨的最好之地，这就有了“九顶铁塔莲花山”之说。

山中的庙宇建筑

过去塔山上有寺观两处，一处是佛教的禅林寺，另一处是道教的岫然观。据县志资料记载，禅林寺位于塔山南麓，又称“下寺”，始建于唐初，清光绪年间重修，整座寺院分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个院落，有殿堂35间，彩色泥塑神像41尊。禅林寺坐北向南，依山朝阳分设东西2门，各为牌楼式建筑。门前5级石砌台阶，沿东门拾级而上，内有火神殿、关帝庙。火神殿前有二人合抱的唐槐2棵，虬枝旁逸参差交臂，两殿之间有一小门与东北院生活区相通，进西门正面为大佛殿，跨宽3丈，内塑如来佛、护法神及十八罗汉，佛殿两侧各建天王庙及神马殿，彩色泥塑四大天王及黄骠、赤兔两神马。大殿后为西北院，正佛殿耸立院中，正佛殿两侧分别建有送子娘娘庙及地母宫。别建一座二层小楼，楼下是铁铸关帝像，楼上为藏经处，楼前一株银杏挺拔独立。建国初期，寺内尚有三个僧人，当家住持俗姓李，卞庄镇田营村人，法号“能云”。弟子两人，其一为附近代村的陈仁亮。

1946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二十六师的一部驻扎禅林寺，将寺院内树木毁坏

垒筑碉堡。1949年解放后，禅林寺辟做试验农场，1954年改做兽医院。1957年建县人委机关，将寺院拆掉以用其物料。今仅存遗址。现在重建的“禅林寺”在塔山东麓，房屋建于1985年，当时为塔山公园的办公室。寺内僧人以及寺中的佛事活动均由抱犊崮“灵峰寺”住持负责安排。现在“禅林寺”属于“灵峰寺”的分院，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佛事活动。

岿然观又称“上庙”。位于塔山主峰顶部，据县内资料记载，建于隋末唐初（约公元618年），清道光年间（1821年前后）扩建重修，共有殿堂24间，彩色泥塑神像35尊。整个建筑分上下两院，坐北朝南。大门在下院南墙正中，为2间过道式建筑，门前13级台阶。门内东侧立建观记事碑，碑东为关帝庙。沿门上行15米，过33级石阶到上院。据原观中道士现年96岁的何元晨老人回忆，上院为四合院，建于九顶的最高处，就是现在大蒜塔的位置。上院南部是一条4米大路横贯东西。路东端是2间过道式建筑即东门。上院正中3间大殿。东有三清殿，西是三皇殿。院北部是3间出厦大殿，即玉皇顶。4根6棱红柱擎厦矗立，大殿名为寿圣殿，上供玉皇大帝。殿前为观音庙，一合抱苍松秀枝参天。1946年底被国民党二十六师筑工事顽抗时毁掉。上院整套建筑加上2间客房，共有房屋15间。1946年底鲁南战役前夕，国民党二十六师的一个前哨连驻扎在岿然观内，解放军从县城东埝头村几次强攻未下，只好向南转移，在大新庄调整了炮位，两发炮弹击中了道观，房屋建筑以及圣寿殿被毁，国民党守军亦被歼灭。现庙中的一段两米余长光滑精美的石棱抱柱，断残后仍旧埋在附近的泥土中。

1945年赵钊县政府办事机构临时驻地设在了塔山的西南山麓，此处是卞庄村外，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周围是一些玉米地，这里就是卞庄子祠的原址。卞庄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卞邑大夫、勇士，祖籍卞庄。因卞庄子居于此，后故名卞庄。卞庄子是鲁国著名的勇士，皇疏说他能够独力与猛虎格斗。《史记·张仪列传》就记述了卞庄子勇猛刺杀两虎的过程，“一举两得”之典故由此而来。他的勇名还在《荀子·大略》载：“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齐国去攻打鲁国，因顾忌卞庄子，不敢经过卞城。卞庄子还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世时，他随军作战，三战三败，朋友看不起他，国君羞辱他。及其母死三年，鲁国兴师伐齐，他请求从战，三战三获敌人甲首，以雪昔日败北之耻，最后又冲杀七十人而告阵亡。卞庄子也曾受到孔子的赞赏。《论语·宪问》曰：“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子路询问德才兼备的完人，孔子列举了这些人的长处，以礼乐加以文饰，算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如今位于塔山南麓的卞庄子祠，早已不复存在，然遗址尚存。

塔山中的树木不多，原有枣树20余棵，柿树20余棵，西南山前有几棵柏树，山后坡是庙中出家人的墓地，山东面有几棵椿树、柏树，顶部有3棵柏树，这些树木都有合抱粗细，是夏季避暑歇凉的好场所。观中香火旺盛，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九、十都要逢庙会。建国前夕，观中还有2个道人，即范永善和何元晨师徒二人，他们只知历经了5代，再以往已无从可查。按“字”排辈，即合、教、永、元、明5辈。“合”字辈有王道珍，“教”字辈有今兰陵县神山镇西庄村的宋教全；“永”字辈的有兰陵县卞庄镇大城东村的范永善、杨庄村的朱永常、连厂村的赵永志；“元”字辈的有卞庄镇一村仍健在的何元晨，现已96岁；“明”字辈只有何元晨1962年收的弟子一人，为附近龙沂庄村的李后军，现年62岁。范永善于上世纪80年代在卞庄一村去世，葬于东沭河边。何元晨入住卞庄一村，他们师徒俩人均还俗娶妻生子。过去塔山及其周围的土地四百多亩，包括树木均为庙产，建国后只保留了22亩地为观中道人耕种食用，其它土地产权全部入公。1954年“五四”青年节，政

府组织青年在山中遍栽柏树，后来又环山周围向东沿洳河圈地420亩栽培苹果树，东部建洳水分流的石砌输水渠道、围墙。1984年5月建立塔山公园。

有关墓碑

塔山的实物考证资料不多，根据何元晨老人回忆，山上共有4块石碑。山的西南角立有一碑最有气势，为王道珍坟前的墓碑。王道珍祖籍山西太原，属于山西太原王氏，道号道珍，真名已不可考，明末崇祯年间进士，朝中官员。明亡，王道珍不愿效忠清廷，因避祸带着一妹、一侄不远千里投奔兰陵隐居，资购土地100亩在塔山出家为道。王道珍的坟墓修的比较宏大，地面以上用青砖垒砌，中空半圆螺旋式结构，方圆占地约半亩有余，有门可进入其中。王道珍是坐缸羽化，用两口大缸上下相扣置于圆形的墓穴当中，上用石板盖顶。墓碑高大镶边带框，石座、碑帽、石香炉俱全，墓碑上刻有范永善、赵永志等后辈弟子名称。1956年县城规划建设，王家后人迁坟后毁掉。另一块是观中的祖碑，再就是山顶的一块道观记事碑，断残后埋于山顶土中。第4块碑位于山东侧一坟前，即现在的老年健身场地边，8棵松下的那座清代坟墓，目前也是塔山仅存唯一的可考实物。从外观形制来看，此碑半圆顶，高约1.8米，宽65厘米，厚20厘米。碑面中榜刻有“皇清待赠孺人显继妣杨太君之墓”，左边的“龙边”刻着死者生卒时间“雍正十年十月十九日子时生，嘉庆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卯时卒”。雍正十年（1732年）到嘉庆六年（1801年），死者经历了整个乾隆执政时代的60年，推算其享年69岁。右边的“虎边”上首刻着立碑时间为“咸丰九年（1859年）孟夏（农历4月）谷旦”。此碑是卞庄镇斜沟村王家的祖碑。

塔山紧邻芙蓉山，与芙蓉山咫尺之遥，芙蓉山是芙蓉楷禅师的家乡，两山彼此对应，在宋代两处都有庙宇，塔山也是芙蓉禅师的主要活动场地。芙蓉禅师死后就葬在了附近，他的塔室和墓碑现就在村内农户的院中。据村内知情人讲，早在民国前期墓塔处就建有“铁神庙”，禅师的墓葬、墓碑就建在了庙中。建国后此处是一片废墟。芙蓉禅师的墓碑在墓穴的西侧，此碑圆首花岗岩石质，面南而立，高3.5米，宽1.1米，厚30厘米，埋入地下约一米。墓碑后遭焚烧，又经日晒雨淋风化，碑体出现了许多裂纹，字迹多处脱落，现在只能读知大概，很难接续成句。碑额用大字篆刻“宋芙蓉楷禅师塔铭”，龙边用小楷刻写“沂州芙蓉道楷和尚塔铭□□□并序”下有“□□□□赐绯鱼袋□□□□书”、“嵩山崇福宫赐绯鱼袋韩昭”，虎边的下首刻“政和八年九月五日”，整个碑面约刻有2000余字，叙述了芙蓉禅师一生的事迹。读之感人至深，其中有“吾去世□□，不得造塔，垒石作□，世礼祇可”显示出一代宗师之高风亮节。“碑阴”是指碑的背面，其上额大字与“碑阳”相同，同样篆刻着“宋芙蓉楷禅师塔铭”，背面碑文的内容不多且字迹非常模糊，前下方刻有“门人吴□□□□撰”、“克顺□□□□书”、“马鞍山十方福圣禅师”等字样，后面顺序排列着大师弟子的名称。下首同刻“政和八年九月初五日”。据《湖北通志》载：“政和八年夏五月乙未，芙蓉禅师以偈示众书，适诚付旷门人，沐浴更衣，当祥示寂，越三日丁酉，荼毗收灵，旷秋九月甲午，塔藏芙蓉湖后。”这一记载，于现存塔铭上的记载完全一致。随着历史的变迁，尽管原来的芙蓉湖早已变成了良田和村庄，但芙蓉禅师墓葬此处是确定无疑的。可幸禅师的这筒墓碑已近千年，仍能保存比较完好，难能可贵，它对研究我国古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徽章中的历史

——谈民国时期的临沂省立中学校

雨田 刘京君



这枚“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徽章发现于临沂古玩市场。徽章正面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章地，背面编号133。那么，它是不是临沂建立最早的学校——“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当年的徽章呢？要弄清它的真面目，还要回顾临沂现代教育的历史。

废除科举制度，推行现代教育，在封闭的临沂历史无疑是一件大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县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府郡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当时山东省分十个府，临沂当时为沂州府，府治在兰山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沂州府官立中学堂”在原考棚旧址建立，开启了临沂现代教育的滥觞。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学堂”改称“学校”。民国二年（1913年）“沂州府官立中学堂”更名为“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民国三年（1914年）又改为“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校”。那么这枚“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的徽章是否为上述这所学校的呢？我们给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其主要理由就是徽章的图案与史实不符。“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存续于1913年

到1914年，仅仅一年时间。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使用五色旗作为临时国旗。5月10日，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1924年6月30日，南北对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才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此章形制与临沂“省立第十中学校”在时间上不吻合。考虑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民党旗，出现时间早于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攻克临沂前，临沂始终在北洋政府治下，高举的是五色旗，所以，地点也不吻合。临沂地区志记载：“至1923年，该校共招生20个班，每班三四十个人不等。”数字上也不吻合。应该说这枚徽章与临沂联系不大，可能是1913年后益都（今青州）成立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那时临沂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已经改名为“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了，1924年又改为“省立临沂中学”。



第二枚圆形徽章，还要从抗战时期说起。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省立临沂中学”随全省公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西迁。1939年春到达四川绵阳地区，尊教育部令合并为国立山东中学，不久更名国立第六中学，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省立临沂中学”的许多学生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1941年后，临沂中学没有随全省中等学校西迁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安徽阜阳。1943年被并入国立第二十二中学。1947年底前，返回临沂，仍称“省立临沂中学”。临沂解放前夕，一部分临沂中学的师生为躲避战争，再次南迁，他们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名义走的呢？上面这枚徽章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是以“山东临沂学联”名义出走的，时间是1948年。至此，民国时期设立的省立中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孤胆英雄李海启

高雷

李海启，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三连七班长，是全团数得着的爆破英雄，诚难可贵的是许多次爆破都是自报奋勇。他奋不顾身，主动陷阵，而每次都能全身而归，这在军中传为神话。

战场上他的长项就是爆破，同时，他的步兵技术也相当精通，还是执行战场纪律的模范。

1944年春天，在讨伐汉奸吴化文的战役中，他光荣负伤，轻伤不下火线，一个人捉了40多个俘虏，缴获一门掷弹筒，30多支步枪。他的事迹在鲁中广为传颂，他的精神鼓舞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二团党总支发出号召“学习李海启同志”，慰问信从各地寄到了野战医院。

李海启静静地躺在那里，左眼还和往常一样睁着，但是已经看不见了。左腿也因失血过多，不能动弹，他微笑说：“这回再瞄准也不用闭上眼了，这腿过几天养好了，上山跑起来还是呜呜的。”

1944年7月，他被全团选为战斗英雄，升为排副的他光荣地出席了山东军区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本次大会上他荣膺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此时



八路军向伪军吴化文部发起攻击

他21岁。

河东战斗，连里分配七班的任务是清理前进道路上的鹿砦，这鹿砦是鬼子阻止八路军进攻砍伐树木设置的障碍物。趁着月亮惨白的光亮，李海启缠着一大捆绳子，带头钻进了鹿砦丛中，仔细一瞧，倒抽了一口凉气，这鹿砦都是放倒的大树，树梢朝外，上面压了许多石头，桎桎上楔了不少楔子，又稠又密。

他将绳子拴在一棵树身上，四个人上前拉纹丝不动，又上来四个人，李海启低声喊着“一、二，一、二”，树枝晃得“扑啦扑啦”直响，敌人的机枪泼水般地打了过来。树枝在忽闪，树影在挪动，敌人死到临头了，还认为是八路军在骚扰，时不时阴阳怪气地叫喊：“别让跑了啊！”“看准了打呀！”

第一道鹿砦清理出来了，第二道鹿砦的树木也拉了出来。李海启自己跑到前面划拉划拉，清出一条路来。

道路清理干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营长在发急，什么都停当了，炸围墙的爆破手还没有上来。坐在营长身旁休息的李海启，用褂子抹了下脸上的汗水，站起身来请战说：“营长，我去，我地形熟悉。”

“不行，”营长说，“你累了。”

一会，李海启第二次请求。又过了一会，李海启又忍不住第三次开口了：“我去炸了吧！谁去不一样，早拿下它不好？”

营长点了点头说：“去吧，你是个共产党员。”

掩护的机枪“哒哒哒”对打起来，李海启跑步穿过鹿砦，把身上的手榴弹捆在一起，塞在了围墙的石缝里，瞬间拉开了弦，跳到了一旁。

“轰”的一声巨响。营长这边对司号员说了句：“吹冲锋号。”那边，李海启带领七班从炸开的豁口翻上了围墙，已经跳进了围子。

西北炮楼上的敌人吓跑了。一阵喊话，东北炮楼的敌人也交了枪。

剩下伪军营部炮楼和一个小炮楼继续顽抗着，伤亡在增加，一排负伤6个同志，七班李海启的战友乔金端英勇牺牲，战友们呼喊着：“替乔金端报仇！”

赶上来的营长，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拍了下李海启的肩膀：“炸他娘的！”

在闪烁的火光中，李海启仔细观察一遍小炮楼的火力点，夹起炸药包，黑影一闪，人已到了小炮楼底下。

他稳稳当当地把炸药顶上门框，点着火迅即离开，“轰隆”一声，烟柱腾起，紧接着“哗啦啦”炮楼坍塌了，20多个敌人全部被埋在了炮楼底下，伪营部炮楼上要命地喊：“投降了！不打了！”

1944年3月25日夜，山东军区以鲁中军区6个团和滨海军区1个团发起第三次讨伐吴化文的战斗。鲁中二团一部围攻西大崮和附近另一高地。团主力围攻磋石，李海启连是突击队，战斗开始不久主攻部队便迅速攻占牛山、大泉庄等外围阵地，并突入纵深，包围了磋石的伪军。这时连长喊李海启上去，教导员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战役的第一炮，你一定要炸开炮楼。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李海启深知任务的艰巨，他把全身的东西都掏出来，做了交代。与王茂仁抬着炸药，匍匐到敌人的炮楼底下，由于没有选准位置，炮楼在爆炸声中晃了晃，只是炸开了一个豁口，不知死的敌人反而更加猖狂。

枪炮声、手榴弹声混杂在一起，电闪雷鸣，李海启重新爬回到碉堡跟前，仔细观察着炮楼的支撑，选准了爆破点，一溜小跑回来，把炸药包绑在一根长杆子上面，又送了上去。

抬到壕沟边，我们的机枪暂停了射击，李海启一个大步跳了过去，王茂仁带着炸药下了壕沟，却上不了。李海启急得直跺脚：“天快亮了，越拖伤亡越大，死也要

完成党的任务。”死扯硬拉把王茂仁拽上来，俩人抬着炸药，贴近了炮楼。

这时已经听得到炮楼上的敌人说话和拉枪栓声，李海启心里骂：“操你娘，一会叫你坐飞机。”

李海启做事干净利落快，他竖上杆子，伸手摸了摸炸药包是否贴紧墙壁，又在杆子下面撮了一堆土，用脚踏实，然后拉断了火弦。看着导火索“突突”闪烁着火星，他才跳下了壕沟。

轰隆一声，地动山摇。尘烟四起，炮楼哗哗啦啦歪倒了。李海启说：“这一霎，我顶喜了。”

第一个从壕沟里跳出来的是李海启，他的耳朵失聪了，别人喊的是什麼，根本听不清楚，只是两眼紧盯着前方燃烧的炮楼。远处的敌人不时地向炮楼这边扔来手榴弹，火势越烧越猛，他看准方向，冲向前去，一脚踢开炮楼的后窗，钻到里面递出来一门掷弹筒，十多支步枪。

天明了。围剿伪一八一团团部的战斗开始了。捆捆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敞顶的碉堡中，敌人被炸得哇哇乱叫，向后院跑去，李海启第一个搭上梯子，窜上了院墙，侧翼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梯子，压制住了后续部队，李海启单枪匹马，孤胆深入。

满院子的伪军人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有的在墙角上挤成了蛋，有的钻进了柴禾堆，有的头套木桶，还有的顶着铁锅，千奇百怪。

李海启一个人一杆枪，手榴弹打没了，枪膛里只有四粒子弹。他艺高人胆大，只身冲进了敌群。横眉怒对，高喊着：“缴枪不杀！”

“不打了，俺缴枪！”“俺缴枪啦！”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李海启贴墙站定，脑子一闪念：“要是这几个敌人一齐拥上来，我一个人怎么应付？”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起劲地催促：“还不快缴枪，手榴弹揍你，刺刀穿你！”

他站在墙根，枪一支支扔到了他的脚下，有20多支。他接着喊：“缴上手榴弹，子弹，有一粒也得缴上。”

里面小院的门打开了，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带着十几个赤手空拳的伪军士兵爬了出来，也加入了投诚的行列。

到这时候那些头上戴着木桶，顶着铁锅的伪军，仍然是一动不动，李海启端着刺刀，每人头上敲了敲，这些人才醒悟过来。

李海启一阵口令，俘虏们纷纷排队，有几个讨好献媚的，递烟的，点火的，惹得李海启一阵痛骂：“娘的。收起这套，八路军跟你们不一样。”

小院里仍有敌人在负隅顽抗，大炮楼上的机枪不停地嘶叫着，李海启庆幸自己堵住了里院的小门，可以关门打狗了。战友们跟了上来，李海启的底气更足了，他亮开了大嗓门：“伪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不要再跟汉奸吴化文等死啦！缴枪优待你们。”

炮楼周围的伪军探头伸脖，停止了射击。

突然炮楼上打过来一颗小炮弹，火光一闪，李海启只觉得面前热乎乎的，左腿一软，身不由己倒在了地上，他对前来搀扶他的同志说：“去夺重机枪……，捉他娘的团长……完成党的任务。”

不断汇合的呐喊声盖过零落的枪弹声，胆战心惊的敌人打出了白旗。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伪军1300余人，俘伪军少将以下军官323人、士兵4800余人，摧毁伪军据点、山寨52处。我们的英雄光荣负伤。

抗战胜利后，鲁中军区二团改编为山东军区三师八团。1945年底由罗舜初、曾国华率领到达辽阳、鞍山一带。该部后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旅二十团、东北野战军

三纵七师二十团。李海启跟随部队，转战东北。

1947年12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冬季攻势，东野主力在彰武、新民一带与国民党新五军进行了血的碰撞，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李海启时任二十团三营副营长。

1948年1月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气温下降到了近零下40度。东北野战军三纵、二纵将新五军军部和一九五师的残部、一个炮团、一个特务营外加上一个保安团，包围在闻家台。

闻家台是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一个不到300户人家的小村子，但地处平原地区，四周一马平川，村子围周都是数百米的开阔地带，易守难攻。加上恶劣的天气，没膝的积雪，加大了进攻的难度。李海启他们营接到的命令：6日22时发起攻击。

没有炮火支援，没有兄弟部队配合，李海启他们猛打猛冲，单刀直入，插进村里。直接捅了“马蜂窝”。瞬间新五军的反击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硬碰硬打下几个院子之后，三营伤亡过半。一个满编的主力营很快就失去战斗力，雪地里横七竖八倒满了战士们的遗体，呻吟声不断，流出的鲜血很快就冻成了冰块，伤员也很快就无声无息了。剩余的部队退守村边一所大院子。

战斗越来越激烈，三营营长牺牲了，教导员张林经负了重伤，能拿动枪的人人有伤，个个挂彩。也不知打死多少敌人，就看见黑乎乎的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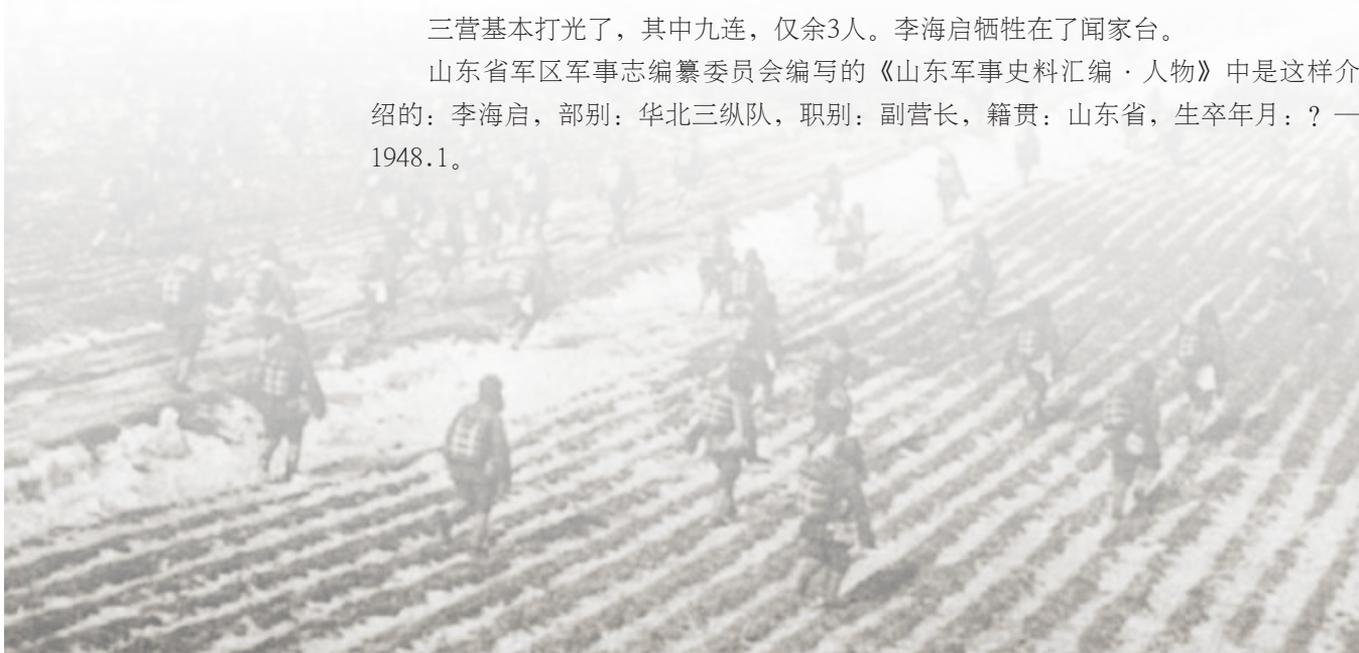
7日凌晨2时半，三纵的大炮响了，二十团一营前来增援。新五军军官大队端着清一色的美式冲锋枪，穿着美式大衣，排得整整齐齐上来了。他们踩着死尸往上冲。有的走着走着，把大衣一脱，帽子甩掉，蓬头散发，嚎叫起来。嚎来嚎去只是一个口号：“为保卫军部而战！”

敌人的嚣张气焰很快被打压下去，我们一营也被打惨了。7日8时30分东野发起了总攻，李海启的战友们坚持了10个多小时后，也加入了冲锋的队列。到了战斗的最后阶段，上万人在风雪严寒之中肉搏冲杀。屯子里的房子早就被双方的炮火打成了断壁残隘，前沿阵地前开阔地上没膝深的白雪都成了黑紫色，一条20多米宽的干河沟，里面填满了双方的阵亡者。有的冲锋时打伤了，腿一软就跪那儿了，雪深，也不倒，一会儿就硬梆梆冻那儿了。一个个呲牙咧嘴，鼻涕拉花的，有的坐在那儿，瞅着好人似的。

战斗很快结束了。战友们寻找李海启，呼唤着李海启的名字。英雄你在哪里？

三营基本打光了，其中九连，仅余3人。李海启牺牲在了闻家台。

山东省军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山东军事史料汇编·人物》中是这样介绍的：李海启，部别：华北三纵队，职别：副营长，籍贯：山东省，生卒年月：？—1948.1。



沂蒙抗战版画群体 (上)

大荒堂主



王绍洛《孙祖战斗》

现代临沂美术作品可以步入世界艺术殿堂大门的首选沂蒙抗战木刻，反法西斯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的共识，而其艺术手段东西方融会贯通。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版画主要表现手法为木刻。

黑白分明、简约凝重的特点承载了一个民族腥风血雨的危难和奋勇不屈的抗争。这是时代的特征，这是它所以芬芳绽放的缘由。

沂蒙版画的创作来自一个战斗的群体——沂蒙八路军。他们中不乏鲁迅先生的学生，他们面向现实，以高于现实的审美姿态，用笔和刀记录了全民族的抗战，为救亡图存而呼喊。这是黑与白的历史，这是血与火的现实，这是生与死的未来。其纪实性与感召力达到了其他美术形式无与伦比、无以复加高度。

梳理作品背后创作者，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真正的战士，在战斗中创作，在冲锋中呐喊，甚至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他们的作品“已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此后人们不断用‘诗性’重建历史的读本。”

王绍洛（1909—1990），山东昌邑人，1909年2月生。1929年在济南

周受周所办美术学校学习，后入上海美专，1931年参加左翼美联，在校发起组织MK木刻研究会。1934年回山东，为山东左联发起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山东鲁艺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东线区情报主任、石岛市工委书记兼市长，青岛市外事处处长等职。

臧著楣（1891—1977），字仲文，以字行世。山东诸城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28年夏始，臧仲文先后在济南东鲁中学、青州第四师范、临沂省立五中、济南爱美中学、市立中学及正谊中学任教。此间，多次在济南、北京等地举行画展。1942年冬，臧仲文在沂蒙山区协助陶钝联系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组织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活动。期间，还帮忙创办鲁艺学校，并在该校任系主任。1949年调文教厅，被分配到华东大学任文艺系教授。1951年，华东大学合并于山东大学，仍任文艺系教授，曾有“汉文法典、文学中西、书画专家”之美誉。1958年调任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主任。



那狄木刻作品

那狄（1918—2010）曾用名那迭云、那逊，满族，河北省易县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1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木刻。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美术教员、干事，八路军一一五师印刷厂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山东画报社主编，东北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前线画报社社长，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战士读物》社长，



宋大可《十八勇士》

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处副处长，《战士》社总编辑等职。

宋大可（1924—1947），原名宋奇。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北金庄人。1938年2月参军，历任鲁南军区抗日宣传队文化教员、《山东通讯》摄影记者、山东军区政治部《山东画报》社摄影记者、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新闻记者。1947年9月7日，在沙土集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七师的战斗中，到前沿阵地采访时不幸中弹牺牲。

任迁乔（1919—1999），山东掖县人。擅长连环画、漫画。历任山东《儿童之友》记者，山东《滨海画报》主编，山东美术工作室主任、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



任迁乔套色连环画
《日出天晴》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 及后续发展 (下)

泰宁军

津浦支队英雄连队

津浦支队一营一连：该连由一二九师直属工兵连的一个排在南宫县扩建而成，是一个有着红军光荣传统的连队，1949年编为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一营一连，曾参加陆房、甲子山、沂水、鲁南、莱芜、孟良崮、开封、睢杞、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二、四次战役，涌现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王玉林”“三大（爱兵、爱民、战斗）模范”范维士等50多位英模人物。1944年鲁中军区授予该连“遵纪爱民模范连”称号，1949年华东军区授予该连“战斗模范连”称号。

津浦支队五连：该连1927年在鄂豫皖黄麻起义中诞生，即使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是资格很老的连队，1949年编为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二营四连，曾参加夜袭阳明堡、陆房、甲子山、沂水、鲁南、莱芜、孟良崮、开封、睢杞、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二、四次战役，涌现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继祯等20余名英雄模范。1942年被山东军区授予“胜利连”光荣称号，以后还荣获“以一胜百”“战斗模范连”等荣誉称号。

津浦支队部分人物

孙继先（1911—1990）山东省曹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参加红军，曾任津浦支队支队长、山纵二旅旅长、鲁中4分区司令员、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师长、副司令员、三纵司令员，建国后任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授中将军衔。

王育民（1915—1938）河北景县人，1934年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搞兵运工作，1937年2月任津南工委组织部长，7月到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初返回冀南，任津浦支队政委，5月带骑兵排赴南宫县取电台，归途中被会道门“六离会”杀害。

杨万兴 (?—1942) 四川人, 1932年参加红四方面军, 曾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六九团十连连长、津浦支队一营营长、山纵一旅一团团长, 1942年11月牺牲。

王吉文 (1916—1948) 湖北红安人, 1930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 曾任津浦支队一营三连连长、二营营长、山纵特务二团团长、山纵一旅三团团长、鲁南三团团长、华野三纵八师副师长、师长, 济南战役中牺牲。

张友钧 (1916—1974) 四川巴中人, 1933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 曾任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十连战士、班长, 津浦支队一营七连排长、二连指导员、山东军区特务团三营副营长、一一五师教导一旅三团三营营长, 建国后曾任空三军后勤部副部长。

曹丕堂 (1916—2009) 安徽霍邱人, 1929年7月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任津浦支队新一营副营长, 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水利工程三师师长、桂林军分区、新乡军分区司令员, 1955年授大校军衔。

张朝忠 (1920—2004) 山东庆云人, 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 曾任一一五师冀鲁边游击三十一支队二大队副官, 曾任津浦支队二营七连指导员, 山纵特务二团二营副教导员、副营长、一一五师教一旅三团连长、鲁南三团二营营长, 建国后曾任海军基地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 1955年9月授海军大校军衔。

董振东 (1911—1998) 山东武城人, 1937年6月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参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与日军厮杀, 回乡后组织抗日游击队, 同年12月编入津浦支队, 任津浦支队二营七连排长、连长, 后任鲁中三分区泰南独立营副营长、一一五师警卫团营长, 建国后曾任六十四军一九二师副师长、一九〇师后勤部长。

彭天琦 (1909—1978) 四川荣县人, 曾任津浦支队工作团团长、新一营教导员, 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华中工学院委员会书记兼院长、西安市委第一书记。

柯邦坤 (1917—1972) 江西宁都人, 1933年8月参加红一方面军少共国际师, 1938年7月调到津浦支队一营三连入鲁, 曾任泰安大队大队长、鲁中一分区特务营营长、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团团长、华东公安师师长、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 1955年授大校军衔。

袁凤仪 (1920—2013) 山东茌平人, 1938年8月参加津浦支队任政治部宣传民运队队员, 后曾任山纵二支队八大队指导员、三营副教导员、山纵二旅营教导员, 建国后任华东空军后勤部政委、空八师政委、空十军副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

孙芳圃 (1917—) 山东惠民人, 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 曾任津浦支队七连指导员、鲁中三团政治处主任、华野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政委、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七十六师政委, 六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1955年授大校军衔。

王晓坡 (1924—) 山东宁津人, 1939年参加八路军, 曾任津浦支队二营七连通信员、山东四师十一团宣传股干事、二十六军七十八师教导营教导员、宣传科长, 建国后曾任总后运输学校政委、天津运输学院政委。

孙司林 (1921—1989) 山东宁阳人, 1939年4月参加津浦支队, 曾任鲁南三团排长、连长、华野三纵八师二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营长, 建国后任岱山守备区司令员、舟嵎要塞区副司令员。



山东省立第五中学

本 编



省立五中一院礼堂及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

1928年12月在临沂城设立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后人们称之为“老五中”，曾是鲁南的最高学府。如今许多年长者提起老五中皆赞不绝口。

老五中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它的前身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成立的沂州中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称山东省立第十中学。1914年改为“山东省立五中学校”。第一任校长是徐鸿策，其后分别是赵灵谷、商自箴、庞镜如、徐眉生、刘承攸。教师初称“教习”，北伐后称“先生”，学生初由各县保送，辛亥革命后统一由学校考试录取。1926年，军阀混战殃及临沂，张宗昌部方永昌驻五中校内，房舍校具惨遭破坏。1928年10月，徐眉生被任命为校长。此时五中破屋颓垣，各级学生合计不到70人。1928年12月，山东省立五中学校改称“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徐眉生仍任校长。

省立五中在徐眉生校长任职期间得到很大发展。校址扩大为四处：校本部仍在考棚街，称为一院；二

院在僧王庙；三院包含洗砚池、琅琊书院和右军祠；四院在南大寺。1929年开始招高中班，仅一年即奉令停办。1930年秋又设高中班。此时的五中课堂里书声琅琅，操场上同学们生龙活虎，读书会、演讲会、话剧团、民乐队等学生活动有声有色。由徐眉生校长作词的五中校歌，如今听起来依然慷慨激昂：“黄海之滨，泰山之阳，巍巍五中，东南之光。蔚我青年，任重道远，民主陶冶，科学训练，纯洁热烈，以爱以战。我们是革命的先驱，我们是社会改造中坚。干！干！干！冲破封建樊笼，站在时代之先！”

老五中具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中共党员刘德生（刘盛华）考入五中，他根据上级指示，在五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五中支部并担任书记。很多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党员和进步学生，如王效先、何秀芝、李清漪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反对不抵抗”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五中学生也积极



省立五中一院理化仪器室



省立五中一院课后娱乐室内景

响应。徐眉生校长坚决抵制反动当局镇压爱国学生。国民党临沂党部诬告徐眉生指使学生砸碎其党部大门招牌，韩复榘下令查处为首学生。学生党员被迫离校，徐眉生校长也于1932年6月被迫辞职。1932年秋，刘承炘继任校长，军统张容溪为训育主任，逮捕进步学生，造成白色恐怖。进步教师刘进之、钟星帆等联合一部分学生，不断与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1934年2月，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改称“山东省立临沂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寇入侵，临沂中学停止招生。1937年冬，中共党员、国文教师段雪生和进步教师刘惜愚（刘进之）、孔祥男的带领临沂中学的一部分师生历尽艰难去延安。另一部分师生，在教务主任王振绪（王晓纶）等人带领下撤向大后方，在四川绵阳参加了“临时国立第六中学”，还有一部分师生则留在临沂或逃往他乡。民族危亡、国家苦难之际，临沂中学被迫停办。



省立五中一院（原考院）东北角部分院落



省立五中二院校门



省立五中四院校门



省立五中三院校门



位于洗砚池南北的三院和四院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五)

赵丹峰



朱耷画像

朱耷和石涛均系明王朝皇室后裔，清初享誉画坛的艺术大师，与石溪（髡残）、弘仁合称为画坛“四大高僧”。以艺术成就而论，朱耷、石涛二人要高于石、弘，对后世的影响亦更为深远。

朱耷系明代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愤然落发为僧，后为传宗接代，又改为道士。朱耷既擅画花卉禽鸟，亦长于画山水。每作画署款必使“八大”与“山人”二字连缀，类似于哭之笑之之意，于是“八大山人”便成为其别号。朱耷画风恣意纵横，不泥拘成法，泼墨勾勒之间宣泄着他对江山易主、国破家亡的激愤之情。郑板桥曾以诗评其画曰：“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所画鱼禽，皆是白眼向天，倔犟之气傲然于纸。所作山水画，多是水颠树歪，充满着荒凉萧疏的景气。抒发了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笔墨简练，造型奇特，高旷纵横，大气磅礴，是朱耷绘画风格的显著特色，与其佯疯狂癫、孤傲愤世的生活形象形成了高度的有机统一。

石涛本名朱若极，系明宗室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明亡之际，年方3岁的若极被太监护送至寺中为僧，法名原济，亦作元济，号石涛，自称苦瓜和尚。早年历游名山胜景，中年住南京，晚年定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计。作为明皇室后裔，石涛将国破家亡的痛楚和久结于心的郁勃之气，全部寄发于书画之中，“有时如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擅长山水，在徜徉于名山大川时注意体察自然景物的特点，一方面主张“搜尽奇石打草稿”，一反当时画坛盛行的仿古之风；一方面又勇于大胆创新，提出作画时应“脱胎于山川”，进入“法自我立”的创作境界，从而使其山水画作，无论布局还是笔法，均不拘一格，呈现出纵横排闥、闪转腾挪的动感与张力。和朱耷一

样，石涛的画风新颖奇特、苍劲恣肆，虽豪放而不失静雅，虽险异却饱含意趣。其画作在当时即名重于世，连清初画坛大师王原祁都由衷赞叹道：“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还是一位功底深厚的绘画理论家，他的“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强调创新精神的“我自用我法”等论述，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就是师承石涛绘画理论和画风而蜚声画苑的一个革新画派。石涛传世作品颇丰，画论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亦称《画谱》），代表性画作有《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竹菊图》《狂壑晴岚图》和《淮扬洁秋图》等。

朱彝尊系清代著名的词人和学者。康熙年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与《明史》的纂修，后出典江南省试。他学识广博，既通经晓史，长于考据，又才华横溢，擅古文诗词，尤以词作成就宏富，今存词达500余首。他与王士禛齐名，主盟词坛50年，有“南朱北王”之誉。作为浙西派的开山鼻祖，朱彝尊的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亦有不少咏物之作，词句炫丽，格律工巧。《卖花声·雨花台》系朱彝尊的一首代表作：“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鱼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这是一首被广为传诵的吊古伤今佳作。在明清易代之际，曾经繁华的六朝古都，如今只剩下衰柳、颓垣和江边渔翁垂钓的斜竿。对金陵萧索景气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对人事更替的兴叹，袒露了诗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为此，清末谭献用“声可裂竹”四字对该词作了高度评价。《桂殿秋》则是一首专事写情的词作：“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与《卖花声·雨花台》吊古抚今的格调不同，这是一首追忆昔日深情女子的短词，用词逸雅，感情细腻，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外，朱彝尊还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曲。由他编辑的《词综》，选唐、五代、宋、金、元词作660家计2250余首，至今仍不失为词学重要选本。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其中《曝书亭集》计80卷，内收词7卷。

现代以来，朱姓中在诸多领域名人辈出，其中有一位光辉的名字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和共和国国史密不可分，他就是被誉为人民共和国“四大开国领袖”之一的朱德（其他三位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位列第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于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统治的护法战争，在滇军曾任旅长等职。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远赴德国留学，在柏林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同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先后两次遭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旋即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夏回国后，受组织派遣到川军中进行革命活动。翌年初，奉命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骨干，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按照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统一指挥、部署，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1928年1月，他和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举行了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同年4月率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即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同毛泽东一起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便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朱毛红军”遂成为中央红军的代名词，“朱毛”亦成为蒋介石焦虑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最大的政治与军事对手。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闽西进军，为建立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8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朱总司令”便成为亿万军民对其永不变更的尊称。

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以第四次反“围剿”为例：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其中由陈诚指挥的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线，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速占南丰、南城。时任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复电说明目前条件尚不利于进攻，红军应求得在运动战中消耗敌有生力量，但却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拒绝。周恩来和朱德在率部强攻南丰不克后，本着“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经二人协商后迅速决定将攻城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寻机歼敌。先后在黄陂、草台岗设伏，一举歼灭前来追击的陈诚部精锐主力近3个师，缴获枪支万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由上海来瑞金，不懂军事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便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全盘交由这位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洋顾问”执掌。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朱德从革命大局出发，仍积极主动地向李德提建议，与李德进行交流。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也说：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即毛泽东）的观点。”朱德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是在为毛泽东辩说，更重要的是想以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说服李德，把红军从困境中引领出来。但刚愎自用的李德听不进朱德的劝说，执意放弃过去数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却命令红军主力与敌打硬碰硬的阵地战，结果导致红军作战接连遭受重挫，使大片根据地陷入敌手。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于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便是日后所说的万里长征。在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主张与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八路军和由其所辖的部分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取得了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和决心。其间，他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领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时称解放区），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1940年5月从前线返回延安，同年冬他适时提出了“南泥湾政策”，倡导解放区军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开展大生产运动，此举对打破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经济封锁，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生活困难和物资供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亲临华北前线指挥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于1949年4月与毛泽东联名发布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需要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朱德的画像是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张挂在一起的，这是追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可忽略的历史性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履职长达17年。在党内，自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直至逝世，他是中共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中央副主席、十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在六十年代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主张。在建国初兼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为使党接受全面执政的考验，围绕党风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朱德在红军初创时期，即同毛泽东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结合其指挥作战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进行了科学地总结和理论升华，客观上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和平时期，他仍关注着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建军方针和原则，对解放军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现代化军事建设人才的培养教育等，均提出了不少具有科学性、可行性的指导意见。

朱德出生于一个贫苦的佃农之家，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亦练就了一副勇挑重担的铁肩膀。凭着这双铁肩，他在井冈山时期为解决红军的给养短缺，曾带领战士们下山挑粮，井冈山崎岖的山道上，曾留下这位红四军军长的足迹。《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亿万中国少年儿童。而后，这条扁担又从井冈山挑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地上。他性格淳朴宽厚，真诚待人，不仅赢得了周围战友们的尊敬，亦赢得了亿万国人的衷心爱戴。

1976年7月6日，这位被誉为“红军之父”的传奇元帅，走完了其90年的人生光辉历程。“人民的光荣”——毛泽东对朱德这位老战友的高度评价，将永远被镌刻在历史丰碑上。

临沂“谷子地”郑沂家

林伟伟 罗志强

电影《集结号》中，主人公谷子地为了九连47个弟兄的荣誉，用尽毕生时间寻找牺牲战友的信息。在临沂，也有这样一个人，他叫郑沂家，从1969年开始，走了三万多公里，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南下广州，北上哈尔滨，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走访老八路、老红军2000多人，为安葬在临沂的86位无名烈士找回了姓名，找到了家乡和亲人，堪称现实版的“谷子地”。他说：“我认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谁在这里打的仗，他是谁，他家在哪里，我们应当找到，记住他。”

“感谢他帮我圆了43年的寻亲梦”

“43年的苦苦等待和寻找，终于帮我圆了这个梦。”2014年，67岁的曾建华不远千里，乘火车从哈尔滨来到临沂，探访母亲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曾建华是这86位烈士受益家属之一。曾建华的母亲张宝珍，原籍临沂县第八区涌泉村（现罗庄区庄坞镇涌泉村），1939年参军入伍，生前为辽吉军区六十团政治指导员，1942年带病参战被害，葬于吉林，当时曾建华才一岁。

“1970年，我大学毕业参军入伍后，爸爸和继母才决定把母亲牺牲的消息告诉我。”曾建华说。自从得知母亲已经牺牲后，曾建华曾决心回临沂一次，探访母亲曾生活过的地方，但一直未能成行。

转眼30多年过去了，2004年，曾建华退休，偶然间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临沂人郑沂家为烈



曾建华（左）拿着母亲的遗像，感谢恩人郑沂家帮助她找到亲人

士寻亲的故事后，决定回临沂“探亲”。2004年7月，曾建华在老伴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了临沂。但在临沂市民政局，曾建华并没有找到关于张宝珍的相关记录，这时他想到了郑沂家。

“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他，并给他留下我在一张母亲墓碑前的老照片和一个电话号码。”曾建华说。和郑沂家简单地交代后，曾建华又回到了哈尔滨。“曾建华走后，我就拿着曾建华提供的老照片仔细观察，发现在墓碑右侧隐隐约约地写着‘原籍临沂县第八区涌泉村’时，就感觉有着落了。”郑沂家说。

郑沂家先后来到了临沂市民政局、市干休所和市区周边老八路走访。在干休所，一位老八路告诉郑沂家，第八区应该属于苍山庄坞镇（现划归罗庄区）。于是，郑沂家又去庄坞镇打听。功夫不费有心人。历经曲折，郑沂家终于和曾建华的舅舅张保聚取得联系。

原来，张保聚早就听说妹妹张宝珍已牺牲，并多次登报寻找妹夫曾照迁，却不知妹夫入伍后已改名为曾明迁。

“一直没有找到，又忙于工作，多年的心愿就这样放下了。”张保聚说。

又一次为烈士寻到了亲人，郑沂家感觉到，自己为烈士寻亲的红色之旅是那么地有意义！他决定，无论多么艰辛，这条路都会继续走下去！

小小少年萌发为烈士寻根念头

郑沂家萌发出为“无名烈士”寻根这个念头时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那一年清明节，学校组织学生到汤山扫墓，那里埋葬着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3位无名烈士。陪他一起扫墓的父亲，念叨着：“烈士用自己的牺牲给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却没人知道他们的家乡、亲人在哪，甚至没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父亲无限敬仰的神情和充满感叹的语气深深烙印在郑沂家心里，他小小的心灵被触动了：要是能为烈士们找到名字，找到家乡该多好啊！

郑沂家也曾是一个兵，1969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十八军一一三师钢八连指导员。郑沂家参军后，为烈士寻根的念头愈发强烈，他利用部队休息时间，开始了为烈士找名字的漫漫征途。在部队11年中，他利用各种机会寻找知情人，先后询问过1200多人次，但都没有结果。

1980年，郑沂家转业回到临沂，从这一年起，他的足迹几乎跑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利用业余时间，郑沂家寻访沂蒙山区老革命、老红军300多人，但仍一无所获。1998年“八一”建军节来临前，妻子交给他2000元钱，嘱咐他为家里添置台冰箱。可他转身就找了石匠，为汤山无名革命烈士立了碑，并决定暂用“魏中华、盛伟大、司光荣”作为3位烈士的名字，谐音：“为中华，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1999年清明节，当看到汤头镇数千中小學生、各界人士来到自己为3位革命烈士立的碑前，寄托哀思，他激动万分，写下了一首诗：“汤山上下人如潮，热泪纷飞溅九霄。烈士长眠五十载，一世英名功德高。亭亭一碑墓前立，松柏苍翠不弯腰。了却心事三十载，地下英魂应微笑。”他说，他这么做，是想给革命烈士的后代来寻找亲人时提供方便；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能够不忘本；给今天只能在书本、电影上看到烈士形象的孩子们一块怀念追思烈士的地方，不忘幸福的根儿。

四处奔波为汤山三位烈士找回名字

郑沂家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为烈士找到亲人，只有一腔热情远远不够。

为无名烈士找亲人谈何容易！郑沂家分析，这些烈士之所以与亲属们失去联系，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多年来各地行政区划屡次变更，烈士当年留下的家乡地名可能与现在的有较大出入；二是烈士当时可能因生命垂危叙述不清，或记录者记载得不够准确。

2000年的一天，一位叫马德水的德州人找到了郑沂家，说自己的哥哥马德山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在临沂一带，希望郑沂家能帮忙找到牺牲的确切地点，并且提供了马德山当时所在部队的

番号三十八军。

循着这条线索，郑沂家一路找到了南京，找到原三十八军一位老首长。老首长回忆，当时部队确实有一位德州籍马姓战士，并清楚地记得他牺牲在当年的汤山战役中。离开南京，根据老首长提供的另一条线索，郑沂家又远赴北京，找到了原三十八军的另一位陈姓首长。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首长回忆，当时马德山确实牺牲在汤山战役中，同时还透露，与马德山一起牺牲的还有一位叫卢百胜的江苏籍战士，两人是一个班的战友，牺牲后就葬在了当地。

一下子找到两位烈士的姓名，郑沂家浑身充满了干劲，他有信心为最后一名烈士找到名字。2004年的一天，一位热心市民告诉郑沂家，江西南昌有个红军村，村里很多老人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郑沂家立即赶往南昌。一位曾经在临沂干休所工作的老领导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曾经有一位刘姓的江西籍小通讯员牺牲在汤山。老领导告诉郑沂家，在李官镇夏村有一个姓李的老人，在当年战斗后曾经帮忙背过伤员，掩埋过烈士遗体。

几经周折，郑沂家在夏村见到了84岁的李姓老人。老人回忆，当年战役结束后，自己确实从战场上背下了一位受重伤的小通讯员，后来因为伤势太重牺牲了，之后就埋在了汤山。牺牲前他模糊地听到那个小战士说自己叫“英明”。前前后后一联系，郑沂家确定了这个通讯员的名字：刘英明。为了求证这个名字，郑沂家再次奔赴红军村，听到刘英明三个字，老领导立即认定他就是那位牺牲在汤山的战士，牺牲时年仅18岁。

路漫漫，红色旅程没有终点

郑沂家在陆续找到三位烈士后，便一发不可收。他的红色之旅使越来越多的烈士与亲人“团聚”。

最初，郑沂家只是想为汤山上的三名烈士找回姓名，然而当他走出山村后发现，在广袤的沂蒙大地上还有那么多的无名烈士长眠于此。走进茶山烈士陵园，212名烈士静静地长眠于苍松翠柏间，一个个凸起的坟冢已经被青草所覆盖，每个坟冢前都竖着一块墓碑，而只有十来块墓碑上刻有烈士姓名，更多的墓碑上只有“革命烈士之墓”的字样。抚摸着这一块块墓碑，郑沂家说，他原意用一生的时间来为这些烈士找回名字！“一定要让烈士魂归故里！”抱着这样的信念，郑沂家四处走访，南下广州，北上哈尔滨，西至内蒙古，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采访老八路、老红军2000多人。

在长达40多年的寻访过程中，郑沂家看过别人的白眼，也遭受过别人的误解，但是家人的支持让他备感欣慰。最初，他的寻访手段十分简单而盲目，先通过部队打听到老红军、老八路的住址，然后上门拜访，从他们口中获取一些当年战争的片段，然后从中整理有用的资源，如果找到烈士姓名线索，他还需要找到起码两位以上知情人进行核实，工作的繁琐可想而知。随着媒体对其事迹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寻求郑沂家的帮助，他家的电话几乎成了寻亲热线，一个个陌生但温情的声音从全国各地传来：“我是烈士亲属，请您也帮我找找亲人吧！”“我是热心市民，给您提供一条烈士亲人的线索吧！”为此，郑沂家让妻子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专职在家接热线，而他则奔波在为烈士寻求的路上。

随着媒体的参与，一个又一个寻找成功的好消息纷至沓来。他已陆续帮助86位烈士联系到亲属，并亲自把这些英雄的名字刻在了茶山最高峰上。他说，还要给烈士们建一座金字塔式的“英名塔”；再把花3000多元钱从全国各地购来的200多块美丽的石头刻上烈士的英名，镶嵌在“英名塔”上。

“人最大的奉献莫过于牺牲生命，在牺牲的人中奉献最大的莫过于那些无名的英雄。”在寻访过程中，郑沂家一次次接受革命洗礼，一次次被烈士事迹感动着。年过六旬的郑沂家粗略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寻访旅程，这一估计还真把自己吓了一跳：走完了3个万里长征。为了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郑沂家将老家的房子改成了国防教育园，他自己担任义务讲解员，向人们宣讲烈士的英勇事迹。郑沂家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也希望有后人能继续下去，帮我、帮烈士圆梦！”

“推”开阴霾是晴空

——记“推拿圣手”时晓光

惠东波



一个健康或貌似健康的人从突遇大病到病愈康复，大概要经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病到如山峰倾覆，乌云密布，心理灰暗绝望；病愈如初时，必天朗气清，心旷神怡，阳光灿烂。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这种感受概莫能外。

这里，必有一位或一群推开乌云、展示晴空的人，那就是医生。

时晓光就是这样的人：临沂市中医医院“中医特色诊疗中心”主任中医师，享受政府津贴，民间誉为“推拿圣手”。

1979年夏天，不满17岁的时晓光机缘巧合学上了中医，使他隐约感到了宿命的安排，不时很有幻想色彩地描绘自己的未来，想到将来会为许多病患者解除病痛，心里便不免有些小激动。面对深不可测的中国传统医学宝库，面对浩瀚如海的中医典籍，本来喜欢中文又有些

功底的他，一头扎了进去，念叨着“之乎者也”，乐不思蜀，成绩自然不落人后，对从医更是信心满满。

1982年，时晓光被分配到当时的临沂地区中医医院，院领导看他身强力壮、朴实能干，安排他到针灸推拿科，成为这个科室恢复高考以后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年轻大夫。迎接他的到处是笑脸，他自己也毫不怯场：刻苦学了这几年，还有什么病咱不敢看？

二

自我感觉与现实的差距，比时晓光预测的要大得多。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刻起，端详着各不相同的患者的表情，倾听着他们千奇百怪的陈述，他经常脑子里会突然空白，其实自己是什么病也看不了，什么病也不敢看！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学习，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他的悟性激活了勤奋精神，决心从零开始，向各位前辈学习。练习推拿手法，他常用数倍于别人的时间，用心体会，细致琢磨，以至于两只手腕肿胀疼痛。科里老同志看得心疼，时常下班后帮他治疗恢复。

时晓光的刻苦与进步，老同事们都看在眼里，准确地掂量着他真实的功力。这一天来到了，科主任丁元廷医生接诊了一位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把时晓光叫在一起诊察分析病情，确定进行“复位”治疗。丁主任突然毋庸置疑地安排晓光来做，他先是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按平时千百次练习的手法，几分钟之内完成，患者站起来走了几步，一脸欣喜与惊奇：好了！丁主任及科里同事哈哈大笑，同称这简直是“戏剧化效果”嘛！时晓光心里当然也暗自得意，脑海中却闪出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戏剧界格言切实的理解。

三

医生的成长在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干中学，学中干，是医术提高不二的选择，是年轻时晓光工作中的主旋律。他知道，除此以外别无捷径。

1986年，山东省举办第一届颈肩腰腿疼治疗培训班，聘请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前来讲学，时晓光有机会参加培训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原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知识、新技术。三个月的时间，他如鱼得水，孜孜以求，视野大开，如站在千佛山顶，泉城美景尽收眼底。

这期间，他学习了当时临沂地区尚未开发的CT诊断技术与中医医疗技术的结合，感叹于中西医结合的魅力与生命力。为了验证手法复位的疗效，他想通过椎间盘突出患者“复位”前后的CT片对照找出规律，为此，他调病例、查资料，再趁晚上去CT室看片子，发现很多患者经过“复位”后，基本达到了治愈效果，而CT所反应的椎间盘却几无变化。他对中医手法复位疗效的机理产生了疑问。

培训结束后，时晓光仍在思考着、探索着其中的因由。在当时医院李院长的支持下，他参与到手术、麻醉等相关科室，细心观察研究，反复实验论证，提出了“椎管内微细结构调整”的概念，证明中医手法“复位”，并非是通过椎间盘的“复位”实现的，而是通过松解神经根粘连，改变突出物与神经根并系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也为中医复位技术的实践修正提出了可靠的依据。此后，在时晓光的科室，“复位”一词被“整复”取代，完成了一次理论上的进步。

在攀登医学科学高峰的崎岖山路中，这是一次升华，一次从“自在世界”到“自由世界”的追求，时晓光感到了这一步的意义。

四



扎实的中医学理论功底加上长期实践中的探索，时晓光据之于《内经》，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在传统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知识相结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留下了一串串令人称道的足迹。

市林业局一位王姓退休老干部，已80多岁，平时身体尚好，属老当益壮一族，却突然间持续无法入眠，做了很多检查找不出病因，多法治疗均无效果，来到时主任处，颤抖着嘴唇说，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吧，我快崩溃了。经过望、闻、问、切，了解到老爷子前段潜心写回忆录等生活状态，结合中医理论，他当场为之扎了一针。次日早老人打电话来说，谢谢你的一针，让我昨晚睡了三个小时，连续6天针灸后，完全恢复。

2015年初夏，一位山师大在读女硕士慕名前来，告诉时主任自己的多年顽疾：从8岁开始，一读书就头疼，发作时难以忍受，一段时间后可自行缓解，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折腾了十几年，但终究查不出原因，同时肥胖，体重160多斤。姑娘说，她是奔其高超医术而来，但只有一个暑假的治疗时间，满怀希望地寄托于这次求医。时晓光收下了这个特殊病人，每天为其扎针治疗，到开学前，原症状基本消失，体重也降到138斤。姑娘惊奇于疗效，感激涕零，说待她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全部拿出来买好东西给时主任。

时晓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患者解除多方面的病痛，专业门类可分，但只要病人需求，自当竭力而为。所以，在主治颈肩腰腿疼痛等伤筋类疾病的同时，在治疗头痛、健忘、失眠、消化功能失调等内科疾病方面，在治疗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方面，在治疗发热、腹泻等儿科病症方面均有建树，每每使患者病愈而不觉其苦。

五

中医医疗技术千年的传承史，在时晓光看来，同时是一代代人不断创新的历史，一门一成不变、教条化的学说，必然是缺乏发展动力而难免萎缩的学说，他有一种激情，有一种在前人基础上探索未知领域的冲动。

几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晚上，城市正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气氛中。已时近半夜，值班室告知有急诊，时晓光急忙赶到，得知是莒南县乡村一位乡医出现急性肠梗阻。这位患者一年前曾因胃大出血而将胃大部切除，当晚不留神吃了半块月饼，引起肚子剧痛气胀，脸色苍白，大汗淋漓，需立即手术，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但鉴于患者身体条件，其亲属又对如此手术感到担忧。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时晓光大胆决定暂不手术，使用针灸疗法。他安顿好患者，顺其胃经探摸，在左腿足三里穴附近找到压痛点，下了一针；又在右侧足三里穴下了一针。一分钟后，奇迹出现了，患者放了大大的一串屁，舒开了眉头，然后跑了趟厕所，胀痛感应声消失。第二天一早，时晓光匆匆来到病房观察，恢复了的患者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感动地说不出话，木讷着语无伦次，眼里却闪着泪光。

其实，时晓光敢于如此冒险的底气，来自于其自创的“痛敏点针刺法”，即发现针刺相应穴位附近的最强烈的压痛点和异常触感点，往往会比准确针刺穴位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也是时晓光运用中医医疗技术治疗临床急症的又一成功案例。

多年来，仅时晓光摸索独创的技术就有治疗颈椎病的“旋转滚筒式整脊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椎间盘源性下腰痛的“拔伸压颤式整脊术”，治疗慢性腰背痛等伤筋类疾病的“软组织理筋整复术”，治疗内、妇、儿科病症的“拨筋点穴按揉法”等等，用这些医术诊疗患者10余万人次，多是立竿见影，应手而愈，总有效率达95%以上。

实践为科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时晓光潜心编写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省以上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7项科研课题分别获省、厅、市科技进步奖。他本人2008年获“临沂市中医医院首批名中医专家”称号；2010年度获临沂市政府“临沂市首席（按摩）技师”称号；2012年获临沂市首批“临沂市卫生领军人才”称号；2014年获“临沂市名中医药专家”称号；2015年获“振兴沂蒙劳动奖章”。

六

医德为上，医德为先。

时晓光从医，主张“从医之初，当先立德，德立之后方可言医；治病之始，当先立法，立法之后手法可施，做到法从心出，手随心转，知其所苦，方能手到病除。”在他面前，求医问药的患者都是需要救治的病人，不分贫富贵贱，胖瘦美丑，他全部视患如亲，一视同仁。他觉得只有这条原则立住了，精湛医术才可能发挥。二者不可能刻意组合，只能自然融合，构成一名“精诚大医”的内涵。

2016年春节刚过，时晓光接待了一位少妇患者，诊断为带状疱疹，他仔细观察了患处，只见腰部大片潮红斑，已出现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疱疹，患者疼痛难忍。对这种病，西医已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以抗生素为主。但随患者同来的婆婆告诉时主任，儿媳已经怀孕，很不容易，担心胎儿受损，恳求他能否用理疗手法治疗。这是个难题，主要是需要胆大心细，一丝不苟，加上高超技巧，才可奏效。看到婆媳俩希冀的求助目光，时晓光决定采用火针疗法。他凝神静气，将银针烧红，把大若豆粒，小似小米的疱疹一个个戳破，一共刺了40多针，直累得眼花臂酸，后背出汗。第二天复诊时，他惊喜地发现被刺破的疱疹开始干瘪，患者疼痛缓解，于是乘胜追击，连续三天继续扎火针，加以拔罐疗法，嘱患者回家后配合艾条灸烤，效果奇佳，就在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点滴的情况下痊愈了。

时晓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底里有一种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醇厚而绵长。

七

时晓光现在名气在外，除院内任职外，还兼任山东中医药大学、滨州医学院教授；山东省五级中医师承教育指导老师；山东针灸学会理事兼临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沂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针灸推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治未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然而，他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毫无报酬的社会任职：临沂市特教中心盲人按摩班的义务指导教师，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20年。

对一个终日忙碌、很少有节假日的主任医师而言，偶尔外出义务代课或许有可能，但一代就是20年，上千课时，就很令人感叹了。

第一次走进盲人按摩班课堂的那一刻，他就受到了心灵的震撼，12个盲人孩子齐刷刷地坐着，仰着的稚气的脸上，写满渴望的表情，却少有对命运不公的怨懣。他想，能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和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就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就可能影响带动他们周围的盲伴。如此美好的事业，对他而言，非但不是额外负担，简直就是他人生题中之应有责任。

他带着满腔热情和挚爱感情开始了教学辅导。每有他的课，总是早早赶到。他摸索着和他们交流。教他们手法时，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练习手法。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心和教学的耐心在盲孩子们心中逐渐扎根，以至于他上课时刚拐上楼梯，离教室门十米之外，孩子就能听见他熟悉的脚步声：别说话，时老师来了！

孩子们一批批学成毕业，每有长进，都会在第一时间用不同方式向时老师报喜。温州有一对盲人姐妹，学成后第一个春节便不远千里，来看望时老师，告诉老师她们每月可挣一万多块钱了。他的学生有一句共同的话：教我们的是时老师！学校其他老师们都有些羡慕嫉妒了，半开玩笑说：我们把这些孩子从五、六岁带到高中毕业，可他们只说是时老师的学生。

现在学校搬离了很远，但他还想这些孩子，想为这些孩子们上课。

临沂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琅琊风云榜》，介绍各界精英，他曾上过一期。面对记者，他侃侃而谈：被患者需要便是我的人生享受，我充分感受到了医生这一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

是的，他为患者扫除病痛阴霾，患者还给他温暖的晴空。在这多霾的年代，真的很珍贵。

● **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到沂水县调研。**5月15日，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到沂水县专题调研新时期方志工作转型升级工作。

刘爱军一行实地考察了沂水县史志开发利用3个基地——山东省沂水县沂蒙手绣协会、沂蒙非遗馆、山东省昌辰文史资料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参观了沂水县方志展览馆。随后就新时期史志工作如何转型升级召开座谈会。

刘爱军在座谈会上就史志工作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做出五点指示。一是新时期史志工作要有干事创新的精神。二是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要有创新。三是要继续探索更多方志服务地方的途径。四是积极提升总结新时期方志转型升级的“沂水经验”。五是方志馆建设要高标准、高起点。一定把沂水方志馆建成新型地情展馆、综合馆，打造成沂水靓丽的名片。

●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到省史志办汇报工作。**5月9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到省史志办汇报工作。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听取了汇报并做重要指示。

刘爱军主任对临沂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继续抓好“三全”目标落实，加快《临沂市志》和县志编纂，推进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和方志馆建设全覆盖。根据省里安排认真做好《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有关编写工作。要把临沂史志人的担当作为精神发挥出来、总结出来，形成“临沂经验”，推出更多高质量史志文化成果。

●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到莒南县调研督导史志工作。**5月3日，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副主任段洪、唐少清等一行5人，到莒南县调研督导史

志工作，考察莒南县新方志馆规划建设情况，听取了莒南县史志工作情况汇报。

● **市史志办召开《大美新临沂》编纂会议。**5月4日，市史志办组织召开《大美新临沂》编纂会议，对《大美新临沂》编纂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 **市史志办赴蒙山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5月6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领14名党员干部职工，赴蒙山管委会开展现场党性教育，并就史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听取临沭县地方史志工作汇报。**5月12日，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听取临沭县委副书记于丽华、县史志办主任崔平工作汇报。

● **市史志办党组学习贯彻“第一期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精神。**5月27日，市史志办召开党组会，传达贯彻“2017年第一期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精神。刘志强就贯彻落实好冀祥德秘书长讲话精神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加快推进我市二轮修志工作，做好市志编修工作，加大对县区志书编修工作的督导力度；二是要做好史志宣传工作；三是要指导县区进一步做好年鉴编纂工作；四是要把方志馆建设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 **市史志办到陕西省地方志馆考察交流。**5月24日，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一行2人到陕西省地方志馆考察交流。

● **市史志办牵手山东医专附属医院走进第一书记任职村。**5月11日，市史志办牵手山东医专附属医院，在选派第一书记任职的宋庄村开展了“走进第一书记任职村‘助力精准扶贫’活动”。

● **《苍山县志》首次发行暨《荀子志》编纂启动工作会议召开。**6月2日，兰陵县举行《苍山县志》首发式暨《荀子志》编纂启动仪式。

● **市史志办召开《沂蒙史志》期刊座谈会。**6月26日，市史志办召开《沂蒙史志》期刊座谈会。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围绕如何有效提升办刊质量的思路 and 对策，与编辑们展开了讨论。

● **《沂蒙精神志》编纂座谈会召开。**6月29日，《沂蒙精神志》编纂座谈会召开。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编修人员就《沂蒙精神志》的内容选材、资料增删、记述语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 **济宁市史志办主任张树礼一行到临沂市史志办考察工作。**6月30日，济宁市史志办主任张树礼等一行7人，到临沂市史志办就方志馆建设、期刊编印、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进行考察交流。

● **《兰山年鉴》（2017）组稿方案发布。**5月，兰山区委办公室、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兰山年鉴》（2017）组稿方案，对篇目设置、行文规范及各供稿单位撰稿分工进行了明确规定。

● **《沂水年鉴（2016）》出版发行。**5月11日，由中共沂水县委、县政府主办，沂水县史志办编纂的《沂水年鉴（2016）》出版发行。

● **罗庄区召开《罗庄区志》暨《罗庄年鉴》编修工作推进会议。**5月10日，《罗庄区志》暨《罗庄年鉴》编修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扎实做好二轮修志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完成出版发行。